

描繪丁文江：論胡適《丁文江的傳記》

任育德

摘 要

《丁文江的傳記》是胡適晚年完稿出版的史學研究成果，也是一篇重要的人物傳記，為研究丁文江的學人提供重要參考。胡適與傅斯年兩位丁氏知交均有意寫傳而不輕易下筆，1950 年傅斯年過世，只有「中國文藝復興運動」的「老兵」胡適最有資格為同時代的人物立傳。1956 年，《丁傳》完稿出版，亦正值中國大陸批判胡適思想運動的高峰。

中國重要的自由主義者胡適透過書寫丁文江的教育背景、個人經歷、地質探勘經驗及學術爭辯，呈現傳主在學科建制、學術行政、從政等方面之多重活動。胡適面對史料匱乏的困境，勉力而為，其書寫不以成王敗寇、革命史觀的格局看待傳主的從政經歷，在官方史觀之外另樹新局，甚為特殊。在 1950 年代的國際冷戰、反共環境，與臺灣內部強調支持蔣介石領導反共的環境下，胡適評估丁氏的蘇俄之行，表現出研究者的「後見之明」與反映作品的時代性。胡適也指出丁氏具有堅定的民族立場，為國家建設盡心力；但於丁氏與執政者之互動則點到為止，著重於學人形象。事實上，丁氏亦兼具政治邊緣人的形象。

關鍵詞：胡適、丁文江、《丁文江的傳記》

Depicting Ting Wen-Chiang: On Hu Shih's *A Biography of Ting Wen-Chiang*

Yu-te Jen*

Abstract

Ting Wen-chiang Ti Chuan-chi (*A Biography of Ting Wen-chiang*), written by Hu Shih in 1956, i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material to studies of republican era historical figures. Hu shih, as a scholar, published his important historical monographs in 1950s. Although with highly willingness, Hu and Fu Ssu-nien, two intimate friends of Ting Wen-chiang (aka. V. K. Ting), are hesitated to write monograph or biography on Ting. After pass-away of Fu, as the “old soldier in Chinese Renaissance Movement”, Hu is most appropriated one to complete monograph about figure in the movement. Biography was completed and published in 1956, twentieth year after Ting’s depature, is also during high-tide of “criticizing Hu Shih’s Thinking” political movement in mainland china.

As an important figure in Chinese liberalism, Hu Shih analyzed Ting’s educational background, personal experiences, exploration works of geology, and academic arguments to show multiple activities in disciplinary institutionalization, academic administration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Ting. Albeit lacking in historical material, Hu did his best effort, and did not make judgment such as “winner takes all” or revolutionary preference often be read in modern chinese revolutionary-orientation historical narration. It is different and new viewpoint from official viewpoint in China. During cold war era, anti-communist environment and pro-Chiang Kai-shek to recovery china in 1950s, Hu’s evaluation on Ting’s soviet inspection tour shows his historian hindsight and reflection on era. Hu also mentioned Ting as one insist patriot, did much effort to achieve nation-building of modern China. Hu mentioned little about interaction between Ting and Chiang Kai-shek. Hu just depicted Ting as a scholar; in fact, Ting was also a marginal man between academic and politics.

Keywords: Hu Shih, Ting Wen-chiang, *Ting Wen-chinag Ti Chuan-chi* (*A Biography of Ting Wen-chiang*)

* Ph.D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of FuJen Catholic University

描繪丁文江：論胡適《丁文江的傳記》*

任育德**

壹、前言

1955 年底至 1956 年初，胡適致力撰寫《丁文江的傳記》（以下稱《丁傳》），同年刊載於《中央研究院總幹事丁文江先生逝世廿週年紀念刊》（院刊）。1960 年，作者撰寫〈校勘後記〉，由啓明書店出版單行本。這是胡適離開普林斯頓大學葛斯德圖書館館長職位後撰作的史學專著，於胡適晚年學術工作意義重大。鑽研丁氏的學者以「珠玉」、「達到相當高的水準」等語肯定《丁傳》，¹並非偶然。也有研究者稱，胡適「詳述了他們的交往及此時（按：新式獨裁之爭）的言論對立，表達對老友相應的同情和理解。」²

《丁傳》成為丁文江研究基石時，卻少有研究關注胡適的寫作動機及時代關連性、胡適在書中欲傳達何種思想主題，以及書中塑造之丁文江形象與真實情形之差異等議題。現有針對胡適探討之傳記與專著，雖觸及胡適與丁文江好友互動，亦罕見探討上述議題。³中共建政後 30 年間，由於官方視丁氏為反面人物，使史界立傳、尋求故舊訪談資料無法進行，直至 1970 年代後期起至今，研

* 本文應用國史館度藏《蔣中正總統文物》、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紀念館度藏《胡適檔案》，及檔案館度藏《北洋政府外交部檔案》，各單位提供協助，筆者深致謝忱。本文完成，感謝陳宏正先生的鼓勵，與諸位匿名審查人提出審查建議，特此感謝。

收稿日期：2013 年 2 月 19 日；通過刊登日期：2013 年 5 月 2 日。

**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輔仁大學全人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¹ 谷小水，《少數人的責任——丁文江的思想與實踐》（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 年），頁 4-5。

² 沈衛威，《自由守望——胡適派文人引論》（上海：上海藝文出版社，1997 年），頁 311。

³ 胡明，《胡適傳論》（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 年）；白吉庵，《胡適傳》（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章清，《胡適評傳》（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2 年）；唐德剛，《胡適雜憶》（臺北：遠流出版事業公司，2005 年）。

究者「不帶偏見地、實事求是地研究丁文江已成為可能。」⁴ 近年丁氏全集、傳記研究和年譜陸續出版，⁵ 以及部分新史料公開，均有助研究進展，但丁氏相關研究亦少見剖析《丁傳》者。筆者認為，若能從胡適專心寫《丁傳》而棄寫他文，⁶ 探討寫作時代背景，及作者選擇那些主題為探討中心，反映胡適晚年對中國時勢發展歷程之回應與省思，也有助於理解胡適晚年思想及心態。本文將透過胡適寫作背景，透過教育、信念呈現丁文江形象、政學之間的邊緣人等問題分析，釐清胡適選用寫作觀點及立場，描繪丁文江以呈現中國近代知識分子與政治間糾葛及省思，與既有研究相互對話，以期更深入理解歷史真相。

貳、動念至執筆寫傳

丁文江（1887-1936），江蘇泰興人，筆名宗淹。英國格拉斯哥大學地質學及動物學學士。曾任中國地質調查所所長、北票煤礦公司經理、淞滬督辦公署總

⁴ 耿雲志，〈序〉，收入宋廣波編著，《丁文江年譜》（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頁1。丁子霖指出，1950年代報刊凡提及丁文江（其二伯父）名字，多為匹配「批判胡適」。夏綠蒂·弗思著，丁子霖、蔣毅堅、楊昭譯，《丁文江：科學與中國新文化》（長沙：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1987年），頁243。原書Charlotte Furth, *Ting Wen-chiang: Science and China's New Cultur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丁子霖譯書，與王仰之撰寫簡明年譜（王仰之，〈丁文江年譜〉，《中國科技史料》，第8卷第4期（1987年4月），頁28-38，均可視為中國作丁文江研究之先驅成果。王仰之，《丁文江年譜》（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89年），是丁氏年譜著作開山之作。

⁵ 何漢威，〈史語所藏丁文江檔案的收藏原委、編輯整理及史料價值舉隅〉，《古今論衡》，第12期（2005年3月），頁3-34；何漢威，〈一九二六年淞滬督辦公署總辦任內的丁文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81第1分（2010年3月），頁37-150；谷小水，〈少數人的責任——丁文江的思想與實踐〉；歐陽哲生，〈科學與政治——丁文江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宋廣波編著，《丁文江年譜》。何氏根據丁文江檔案，為丁氏淞滬督辦公署總辦活動補足空白；宋著引用各檔案館、研究機構度藏政府公報、公私檔案，建構譜主早年活動，取材內容較歐陽氏同一年出版著作，更形豐富。

⁶ 〈胡適致雷震函〉，1956年4月1日，收入萬麗鵬編註，潘光哲校閱，《萬山不許一溪奔——胡適雷震往來書信選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頁91-93。

辦、北京大學教授、中央研究院總幹事等職。⁷ 於 1935 年 12 月 9 日衡陽旅次中了煤氣毒，併發腦溢血，於 1936 年 1 月 5 日過世。丁氏是現代中國地質學科的重要先驅與開拓者之一，亦參與北方學人輿論刊物《努力》、《獨立評論》撰稿，極富組織活動力。梁啟超（1873-1929）逝世後，丁氏於《梁任公年譜長編初稿》架構成形具有關鍵作用，⁸ 顯示丁氏既是專業的地質學者，亦有史識及史德。

丁文江的友人敬稱他為「丁大哥」。⁹ 丁氏過世後，《獨立評論》第 188 號（1936 年 2 月 16 日）出版紀念專刊（含 18 篇文章），另有分散在同刊各期之 9 篇紀念文字，成為寫傳的基礎；但丁氏出任孫傳芳（1885-1935）淞滬督辦公署總辦經歷有爭議性，致使相關書信文電未獲公開，限制傳記寫作。胡適指出，若有這批資料，「將來作他傳記的人必定可以有詳細公道的記載給世人看」。¹⁰ 北京大學教授傅斯年（1896-1950）哀悼之餘，表示將寫作 3 文：〈丁文江與中央研究院〉、〈丁文江與蘇俄之試驗〉、〈我在長沙之所見〉。傅氏宣示，希望胡適出面作傳，如胡不作，將自告奮勇進行，¹¹ 但傅氏並未完成上述各事。

⁷ 《申報》引中央社電及《字林西報》引路透社之長沙英文通訊稱，丁文江（V. K. Ting）在德國弗萊堡大學作研究並取得博士學位，但並無其他資料可以證實。參見〈丁文江昨逝世〉，《申報》，1936 年 1 月 6 日，版 4；“Death Takes Noted Geologist” (January 5, Reuter), *The North-China Herald* (Weekly Edition of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字林星期周刊》), January 8, 1936, p. 49.

⁸ 丁文江為《梁任公年譜長編初稿》立下指導意見，包括：一、年譜要全面地、真實地反映譜主的面貌；二、資料以梁氏書信為主，其他資料少用；三、以編年體為主，用語體文編輯年譜長編。趙豐田草擬編例，丁氏修改成 25 條。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年），頁 3。

⁹ 傅孟真，〈我所認識的丁文江先生〉，《獨立評論》，第 188 號（1936 年 2 月 16 日），頁 5。

¹⁰ 胡適，〈丁在君這個人〉，《獨立評論》，第 188 號（1936 年 2 月 16 日），頁 12。丁氏遺囑指定書信文電由丁文淵、丁文治處置。書信文電後由翁文灝經手保管，可能於 1940 年代前期和梁啟超年譜併交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收藏，見竹垞生，〈丁在君先生之遺囑〉，《獨立評論》，第 211 號（1936 年 7 月 5 日），頁 19；餘見何漢威，〈史語所藏丁文江檔案的收藏原委、編輯整理及史料價值舉隅〉，頁 10-11。丁氏家人在 1936 年 2 月 19 日即函胡適表示，希望編丁氏年譜。宋廣波編著，《丁文江年譜》，頁 492。

¹¹ 傅孟真，〈我所認識的丁文江先生〉，頁 2。白吉庵指出，徐志摩空難辭世後，傅、丁就是胡最親近的朋友，透過胡適從中撮合，1931 年起，二人建立深厚交情。白吉庵，《胡適

1936 年 1 月 4 日，胡適知道丁文江病情危急，甚為憂慮，獲知丁氏過世訊息，更是難過，認為是學術界無法彌補的一大損失。1 月 8 日，在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飯局中，諸人談起丁文江之死，使胡不禁「淒然淚下」。¹² 面對好友傅斯年的催促，胡適說：「孟真和我都有將來作在君傳記的野心」。¹³ 傅、胡欲為丁作傳，既有私誼，亦有歷史意義：

我以為在君確是新時代最良善最有用的中國人之代表；他是歐化中國過程中產生的最高的菁華；他是用科學知識作燃料的大馬力機器；他是抹殺主觀，為學術為社會為國家服務者，為公眾之進步及幸福服務者。這樣的一個人格，應當在國人心中留個深刻的印象。¹⁴

他是一個有幹才的人，絕不像我們書生放下了筆桿就無事可辦，所以他很自信有替國家辦事的能力。……他不是革命的材料，但他所辦的事，無一事不能辦的頂好。¹⁵

前幾年我在 寫在孔子誕辰紀念之後，曾說：「凡受過這個世界的新文化的震撼最大的人物，他們的人格，都可以上比一切時代的聖賢，不但沒有愧色，往往超越前人。」我舉出九個人：高夢旦、張元濟、蔡元培、吳稚暉、張伯苓、周詒春、李四光、翁文灝、姜蔣佐。

我現在要補幾個人：丁文江、侯德榜、陳光甫、范旭東。¹⁶

胡適顯然贊同丁文江是「最有用」的中國人之論。1938 年 8 月 25 日，胡適在比利時安特衛普閱報得知徐新六（1896-1938）搭乘客機遭日本攻擊，一路上坐立不安，在日記寫下「國內友人，在君、新六為最可敬愛，在君已死，新六何可再失！」之後更提到「這些有用的人都不盡其用而死，我輩後死者的責任更重了。」¹⁷

傳》，頁 319。

¹²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4 年），第 7 冊，頁 304、305、317-318，1936 年 1 月 4、5、8 日。

¹³ 胡適，〈丁在君這個人〉，頁 12；〈胡適致周作人函〉，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冊（北京：中華書局，1979 年），頁 298。

¹⁴ 傅孟真，〈我所認識的丁文江先生〉，頁 2。

¹⁵ 胡適，〈丁在君這個人〉，頁 13。

¹⁶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 8 冊，頁 4，1940 年 1 月 3 日。

¹⁷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 7 冊，頁 594、595，1938 年 8 月 25 日、26 日。

1927 年底形式上統一的中華民國，1949 年後陷入分裂；胡適則由學至政（中華民國駐美大使），再擔任北京大學校長，1949 年寓居美國。傅斯年以無黨派社會名流身分議論政事，於臺灣大學校長任內驟逝。胡適悼念傅斯年時，顯以丁氏對待青年學者標準視之，¹⁸ 將丁、傅相提並論。胡適面對世局激變與個人際遇變化，心中感嘆良深。更追念起「這一個最有光彩又有能力的好人；這一個天生的能力能領導人，能訓練人才，能建立學術的大人物。」¹⁹ 也因此，胡適就算靠友朋、後輩蒐集資料（無法完整蒐羅文章、保存書信留在北京不及帶走），²⁰ 仍願撰文，且因下筆不休，完稿超過 10 萬字，成為寫過最長的傳記。胡適的北京生活忙於公私諸事，美國生活清閒得多，縱使中文資料欠缺，卻可專心構思寫作，是有利也有弊。

從 1920-50 年代，胡適為包括《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三水梁燕孫先生年譜》在內等 20 多種傳記與年譜寫序言，從學生時期開始編寫的傳記、年譜或傳記性論著亦達 40 餘篇，顯示他熟悉也樂意寫傳記文學。²¹ 因為具有寫傳經驗也清楚研究方法，使他斟酌傳記的下筆時機。胡適希望能調整傳統中國短篇性、對人事物環境有避諱的列傳寫法，以新手法寫傳記；傳主不只有大人物，也要有小人物。他注意到中國偶有偉人傳記，但「人格風範皆不能成為多數人的讀物」。²² 這都促使他思考使用淺白文字與新手法書寫好友的傳記。

¹⁸ 「他〔按：傅斯年〕待青年學者，能盡督責之職，同時又最能鼓舞他們上進。在這一點，他最像丁在君。」〈胡適致俞大綵函〉（1951 年 1 月 6 日），收入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 年），第 6 冊，頁 2158。

¹⁹ 胡適，《丁文江的傳記》，頁 2。

²⁰ 侯外廬援引部分胡適未攜走日記手稿與書信作為「批胡」材料，見侯外廬，《揭露美帝國主義奴才胡適的反動政治面貌》（漢口：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 年）。書刊部分來源，見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 6 冊，頁 2342，1953 年 7 月 4 日。胡適去哥大圖書館看書，見唐德剛，《胡適雜憶》，頁 44。楊聯陞亦抄錄《獨立評論》丁氏文章供作參考，見〈楊聯陞致胡適函〉（1956 年 2 月 5 日），收入胡適紀念館編，《論學談詩二十年：胡適楊聯陞往來書札》（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年），頁 295。

²¹ 章清，《胡適評傳》，頁 219-221。

²² 胡適，〈論六經不夠作領袖人材的來源〉，《胡適論學近著》，第 1 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 年），頁 521。

胡適寫作態度審慎，使他不肯輕易下筆。1951 年底，香港《中國之聲》社長張國燾（1897-1979，曾就讀北大理科）以丁文江逝世紀念日將屆為由，向張君勱（1887-1969）、胡適、丁文淵（1889-1957）等人邀稿，「此固對一代科學巨人之推崇，即對國內外學術界人士，亦可藉此表示吾人之觀感。」²³ 胡面對張氏邀約，亦未輕言下筆，可見他對下筆之審慎態度。

1956 年將屆丁文江逝世 20 年，中研院史語所計劃透過刊物以紀念專號形式致敬，無論主觀意願與客觀事實，胡適責無旁貸，從邀稿、蒐羅《獨立評論》相關文章收入專號出力。²⁴ 胡適爭取友人撰文之外，最重要的是親自執筆為好友作傳。他原本只計劃寫 2 萬字，卻無法停筆，不得不更改寫作計畫。原本 1955 年 3 月《自由中國》之編輯同人敦促胡適為文回應中共發動胡適思想批判運動，該年 11 月間胡也透露要寫兩篇文字，卻未完稿。²⁵ 這事與寫作《丁傳》有些關係。胡適收集資料告一段落，正式寫作《丁傳》的時間約 3 個月，於 1956 年 3 月 6 日完稿。²⁶

1956 年 2 月，雷震（1897-1979）知道胡適正在寫《丁傳》，即致函爭取獨家刊登及單行本發行權，稱書名為《丁在君先生小傳》，其他函件所謂《在君先生小傳》、《丁文江傳記》均指同書。²⁷ 因為文稿約定交中央研究院出版，雷氏無法獲得獨家發行權，轉而爭取優先刊登權。3 月 22 日，朱家驊（1893-1963）去信詢問胡適，有關《自由中國》刊載《丁傳》其中一章意見。²⁸ 胡於 4 月初（《丁

²³ 「張國燾致胡適函」（1951 年 12 月 3 日），〈與其他張姓的往來書信〉，《胡適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紀念館藏，館藏號：HS-US01-091-002。

²⁴ 〈胡適致朱家驊函〉（1956 年 4 月 19 日），收入耿雲志、歐陽哲生編，《胡適書信集》，下冊，頁 1269。

²⁵ 〈雷震等致胡適函〉（1955 年 3 月 22 日）、〈雷震致胡適函〉（1955 年 11 月 5 日），收入萬麗鵬編註，潘光哲校閱，《萬山不許一溪奔——胡適雷震往來書信選集》，頁 71-72、84。

²⁶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 9 冊，頁 182，1956 年 3 月 7 日；〈胡適致楊聯陞函〉（1956 年 3 月 7 日），收入胡適紀念館編，《論學談詩二十年：胡適楊聯陞往來書札》，頁 297。胡在函中稱，寫《丁傳》時「幾乎忽略通信」，或有幾分真實性。

²⁷ 〈雷震等致胡適函〉（1956 年 2 月 17、26 日），收入萬麗鵬編註，潘光哲校閱，《萬山不許一溪奔——胡適雷震往來書信選集》，頁 88、89。

²⁸ 「朱家驊致胡適函」（1956 年 3 月 22 日），〈與朱家驊的往來書信〉，《胡適檔案》，館藏號：HS-NK05-014-035。朱表示，因部分文章不盡符合院刊學術屬性，將改以紀念專號

傳》已完稿）告知雷震，已回函協調朱家驊、李濟（1896-1979），《丁傳》一部分可先交《自由中國》發表，既可為中央研究院刊行本作廣告，有利無害；也提出優先發表篇章方案，請雙方商決。該信同時表示，思想批判文章架構分析必須重新進行，不得不予以擱置，以全力投注《丁傳》，擬以《丁傳》文字充抵稿約。該信也指出他從 1955 年冬天開始寫作《丁在君傳記》。胡將文章交予刊物發表及捐款，以行動支持刊物。²⁹ 此函也透露胡適撰寫《丁傳》之強烈熱情、重視與完成意願，讓他下決心結束「兩面作戰」，以「專心」一志寫傳。「專心」以及使用學術引註，更貼近胡適寫作與思考習慣。從〈思想批判〉一稿顯示，胡適使用大量徵引方式，無法直接切入主題與論述簡潔有力，成為明晰的政論文，或亦迫使胡適停筆。胡適系列回應將該書標題從「小傳」改為「傳記」，應與篇幅擴大有關。刊物優先獨家刊登〈丁在君與徐霞客〉、〈丁文江留英紀實〉兩章，³⁰ 刊物、史語所均有所得。

胡適寫作《丁傳》的外在環境，與心理動機不可脫離。按中共建政起發動思想改造、批判運動。1952 年間，胡適為劉紹唐（1921-2000）之《紅色中國的叛徒》寫序，談到思想改造問題，摘錄金岳霖（1895-1984）坦白，表示「是不是毛澤東和他的政權已經很成功的做了一件不可能的事。就是將這一位最倔強的個人主義的中國哲學家的腦給洗乾淨了？還是我們應該向上帝禱告請准許我們的金教授經過了這樣屈辱的坦白以後可以不必再參加『學習會』了？」³¹ 顯示他既注意老友動態，也關切在共產新社會下，個人／自由主義者將如何自處的問題。

出版。朱對雷請求刊載胡著章節感到躊躇；李濟表示只要於摘錄文前加上說明，表示全文將在何處發表即可，有先例可循。因二人意見不同，朱請胡裁奪。

²⁹ 〈胡適致雷震函〉（1956 年 4 月 1 日），收入萬麗鵬編註，潘光哲校閱，《萬山不許一溪奔——胡適雷震往來書信選集》，頁 91-93。朱於 4 月中回函將遵胡囑，以徐霞客一章交予《自由中國》發表。「朱家驊致胡適函」（1956 年 4 月 12 日），〈與朱家驊的往來書信〉，《胡適檔案》，館藏號：HS-NK05-014-036。

³⁰ 胡適，〈丁在君與徐霞客〉，《自由中國》，第 14 卷第 9 期（1956 年 5 月 1 日），頁 7-8；胡適，〈丁文江留英紀實〉，《自由中國》，第 15 卷第 5 期（1956 年 9 月 1 日），頁 5-6。勞幹曾為文稿付排時名稱不一事致函胡適，建議應按標題，一律統為「傳記」。李濟建議亦同。「勞幹致胡適函」（1956 年 9 月 12、19 日），〈與勞姓的往來書信〉，美國檔，《胡適檔案》，館藏號：HS-US01-014-023、HS-US01-071-004。

³¹ 胡適，〈《紅色中國的叛徒》導言〉，收入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 6 冊，頁 2293。

同年 11 月 19 日，胡適在訪臺記者會表示：「朱光潛（1897-1986）、顧頡剛（1893-1980）都是我的老朋友，他們寫罵我的文章，還是引我的書裡面的話。在鐵幕裡還有人看胡適的書，足見中『胡毒』的人還是很深，想清算也清算不了。」「他們清算『胡適思想』，等於溫習胡適的書。」³² 1953 年中，胡適於《胡適文存》合印本〈自序〉中重申，「我的一些著作雖然未必都值得長久保存流傳，但在大陸上的共產黨燒毀我的書的時候，在這個共產黨『清算胡適思想』的時候，我應該讓自由中國與自由世界的人們知道究竟『胡適思想』是什麼，究竟『胡適思想』為什麼值得共產黨的瘋狂清算。」³³ 胡適提醒讀者們，這時尚非批胡運動高峰，³⁴ 胡適已明示：要讓自由世界人們知道以他為主的一代人展現個人、自由主義思想在中國「是怎麼一回事」，有多少影響力，展現自信。除了重新出版自身著作，若能擴增介紹同代且早逝之同道，思想傳播工作將更為堅實。

在胡適思想批判運動之後 50 年，有研究者指出「批胡」是「必然的」，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成為意識型態最高指導時，必須對「以胡適為代表的資產主義思想體系進行清理」；「批胡」也在思想界掀起學習唯物論高潮，³⁵ 這是從政治發動者與爭取意識型態主導角度著眼。這位中共發動缺席審判之主角——胡適，敏銳地感受到「思想清理」背後之政治意涵，與敵我對立氛圍，但他絕對想不到影響層面之廣與時間之久。但中國「批判胡適思想」，讓胡適確認其作為思想指標之作用，也成為他與蔣介石接近之觸媒。

1954 年起中國發動大規模「批胡」，胡適陸續從友人處獲知相關訊息，如在曼谷服務的沈怡（1901-1980）會收集海外有關批判胡適之剪報郵寄。³⁶ 胡收到

³² 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 6 冊，頁 2229、2188，1952 年 11 月 19 日、1951 年 8 月中。

³³ 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 6 冊，頁 2342，1953 年 7 月 4 日。

³⁴ 胡明，《胡適傳論》，下冊，頁 1038。

³⁵ 胡尚元，〈胡適思想批判運動及其消極影響——史學領域的一個視角〉，《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29 卷 3 期（2005 年 5 月），頁 110；錢理群亦歸結為「必然論」，當毛澤東從 1953 年由發展新民主主義進入社會主義改造與革命後，要在思想文化領域批判資產階級思想，胡適被視為中國資產階級總代表遭到批判，中共藉此加強全面控制思想文化學術。錢理群，《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 1949-2009：另一種歷史書寫》（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2 年），上冊，頁 54-55。

³⁶ 按沈怡時任聯合國亞洲暨遠東經濟委員會防洪及水利資源開發局局長，沈家姊妹分別嫁給

沈氏持續郵寄剪報後，打趣沈以紅鉛筆標示處「看了這些文字，生氣比我還大！」之餘，也憂心《人民日報》王若水（1926-2002）署名文章稱「胡適的……『學術思想』幽靈還附在俞平伯和其他一部分文化界人士的身上」，因為「這幾個字可以陷害多少人，可以清算多少人！」胡適是有自信的說：「這『幽靈』是掃不清，除不盡的。苦的是一些活著的人們要因我受罪苦！」除夕夜想到此事，不禁失眠。³⁷ 唐德剛（1920-2009）也會將批判材料按時帶給胡適看，「我們師徒研讀（按：批胡材料）之下，我的確也相信共產黨沒有批倒他。」³⁸ 他這位「中國文藝復興運動」的「老兵」已是共產黨之敵：

為什麼「胡適思想」被共產黨特別提出來做幾次大規模清算批判的目標呢？這當然是因為在這個中國文藝復興運動的近 40 年的過程中，有好幾位急先鋒或是早死了，或是半途改道了，或者是雖然沒有改道而早已頹廢了，……只剩下我這一個老兵總算繼續不斷的努力工作了近 40 年（從民國 4 年開始討論中國文學革命問題的時候算起），沒有半途改道，沒有停止工作，又沒有死，所以共產黨周揚去年 12 月 8 日宣告：他（胡適）是中國馬克斯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的最早的、最堅決的、不可調和的敵人。³⁹

由此可知，在當下時局環境背景中，由「中國文藝復興運動」的「老兵」為運動人物立傳，並不令人感到意外。

黃郛、陶孟和、錢昌照。陶孟和妻沈性仁（1895-1943）翻譯王爾德《不可兒戲》，加入新月社，與徐志摩、梁思成、胡適等人結識為好友。

³⁷ 〈胡適致沈怡函〉（1954 年 12 月 17 日、12 月 21 日、1955 年 1 月 3 日），收入耿雲志、歐陽哲生編，《胡適書信集》，下冊，頁 1238-1240。

³⁸ 唐德剛，《胡適雜憶》，頁 184-185。

³⁹ 胡適，〈四十年來中國文藝復興運動留下的抗暴消毒力量（「中國共產黨清算胡適思想的歷史意義」）稿〉，收入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 7 冊，頁 2508。

叁、人物形象架構：教育、信念價值

胡適以傳主生平事蹟線性發展為序，安排《丁傳》章節。結構上，一條主線為傳主出生、教育、留學經歷。另一主線包含學成歸國之事業推展、旅行地質探勘經歷和學術論辯。在寫作接近結尾時，看過部分手稿的唐德剛形容為「范氏大代數」（即數學教科書）寫法，偏重傳統傳記正規呈現，欠缺融合無徵不信與生動活潑的部分。⁴⁰「中國文藝運動的老兵」胡適，以學術註釋體例撰寫《丁傳》，在「穩」中求「立」，傳達訊息，寫出「可讀又可信」的傳記，以「拋磚引玉」。⁴¹

胡適與丁文江均生在大家庭，胡是么子，丁是次子。兩人從小展現才華，啓蒙教育始於西力衝擊較少的「文化型內地」，幸運得到支援離鄉，在開放環境——大城市受教育，進而出國留學。胡適感同身受地評斷：「如果在君當年沒有被龍知縣救援出來，他的一生事業也許會被埋沒在那個風氣閉塞的泰興縣裏了。」⁴²母親對孩子的人格塑造多以家族和睦、寬以待人為主，也為他們安身立命提供基礎。母教也告訴他們要「志向遠大，不囿流俗」。在鄉讀書時，丁把握機會博覽經史子、小說各類書籍；胡在讀書之餘亦喜好閱讀小說。⁴³傅斯年說：「我們思想新，信仰新；我們在思想方面完全是西洋化了；但在安身立命之處，

⁴⁰ 唐德剛，《胡適雜憶》，頁 169。

⁴¹ 胡適，〈自序〉（1933 年 6 月 27 日），《四十自述》（臺北：文海出版社，1983 年），頁 6。

⁴² 內地（hinterland）經濟基礎以農業為主，行政與管理系統以傳統為主，思想文化傾向以儒家為主，是中國傳統價值之根本。沿海（littoral）不管在區位還是經濟，都因為開放對外公通，產生商業化、行政與管理系統的現代性、思想文化傾向基督教，不以儒家為一元中心之價值。此時的沿海範圍包括上海、廣州。詳見 Paul A. Cohen,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 241-243. 餘見胡適，《丁文江的傳記》，頁 30。按龍知縣即龍璋（研仙）。

⁴³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 1 冊，頁 19、23，1906 年 4 月 21 日、5 月 2 日；丁文濤，〈亡弟在君童年軼事追憶錄〉，《獨立評論》，第 188 號，頁 45-46。

我們仍舊是傳統的中國人。」⁴⁴ 丁文治回憶中也提及由兄長負擔學費，承擔家庭義務。在外國學者眼裡，這的確是中國人的表現。⁴⁵

胡適受限於有關丁氏早年資料不足，謹慎推敲丁氏赴日讀書時間為 1902 年，1904 年轉赴英國，與房兆楹日後蒐羅史料對照吻合，胡適也不禁感到得意。⁴⁶ 但胡採丁文濤初記，稱丁文江於 1899 年可能為秀才之說，既遭丁文淵否認，亦有研究者透過丁文濤其他記述與考證對照證實不確，⁴⁷ 這也是胡適推敲遭到修正者。

胡適描述丁文江的英國學習經驗時，引用丁提到就讀中學期間，受到紳士家庭照顧，得以瞭解英國中產階級的社會生活。一度就讀劍橋大學，因無法支付學費便離校赴歐洲遊歷；返英考入倫敦大學醫科預科，因一門科目不及格而棄醫；轉至格拉斯哥大學主修動物學，副修地質、地理學，1911 年以動物學及地質學雙主修畢業。⁴⁸ 胡適就有限資料寫出丁氏在英國求學的經歷，著重在中國青年學子在留學時要如何與當地人接觸、認識並熟悉當地風土民情、學習社交禮儀、理解對方想法、增廣經驗見聞，亦是胡適的經驗談。⁴⁹

⁴⁴ 傅斯年論及，孫文雖有陳舊思想，立身處事全為西洋人，肯幹，與他們不同。胡適以為然。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 5 冊，頁 581，1929 年 4 月 27 日。

⁴⁵ 夏綠蒂·弗思著，丁子霖、蔣毅堅、楊昭譯，《丁文江：科學與中國新文化》，頁 18；Charlotte Furth, *Ting Wen-chiang: Science and China's New Culture*, p. 21.

⁴⁶ 胡適，〈清末民初洋學學生題名錄初輯序〉，收入房兆楹輯，《清末民初洋學學生題名錄初輯》（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2 年），頁 2。1902 年 8 月，丁文江抵達日本，入東京法學院，學習一年半後赴英。房兆楹輯，《清末民初洋學學生題名錄初輯》，頁 6。

⁴⁷ 胡適，《丁文江的傳記》，頁 8；歐陽哲生沿襲胡適此說（見《科學與政治——丁文江研究》，頁 161）。費俠莉可能是最早懷疑丁應生員試者。（Charlotte, *Ting Wen-chiang: Science and China's New Culture*, p. 19.）宋廣波比對丁文濤、丁文淵兄弟記述得出新論斷，並進而依據丁文濤資料指出，1902 年夏，丁雖應父命到南京參加鄉試，到寧後遊覽名勝古蹟，不以為意。宋廣波編著，《丁文江年譜》，頁 36-37、42。

⁴⁸ 胡適，《丁文江的傳記》，頁 19-23；歐陽哲生、宋廣波均將劍橋一年說，修正為半年。歐陽哲生，《科學與政治——丁文江研究》，頁 161；宋廣波編著，《丁文江年譜》，頁 58。

⁴⁹ 胡適與美國人之社交活動，熱烈參與校園與跨校活動、發表演說、編輯留學生報紙，更讓胡適成為康大知名學生之一。參見江勇振，《舍我其誰：胡適》，第一部（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1 年）第 4、6、7 章相關陳述。

至於在課業學習部分，限於資料及不同專攻，胡適無法交代丁文江何以選擇動物學、地質學為主修。胡適只點出丁氏「出洋之後，最得力的是達爾文、赫須黎一流科學家的實事求是的精神訓練。」⁵⁰ 費俠莉（或譯弗思 Charlotte Furth）之相關推演有其說服力，既從地質學在中國採礦業的用處解釋丁氏的學習動機；又從社會達爾文主義及學科發展觀點指出，20 世紀初期，英國生物學界為進化論爭論未休，赫須黎支持提倡達爾文學說，推論嚴謹，吸引丁文江從思想上信服。丁氏因此確立了透過科學追求實證歸納找出科學與社會問題的分析與解決之道的信念。他相信科學家知識的監護人，知識有助於社會與人類的進步。20 世紀初期，歐洲的現代地質學已趨成熟，學者各有專攻；中國地質學仍在未知領域，使丁文江回國後更有機會體驗 19 世紀自然學者們的探險經驗，從事跨領域研究。英國留學經驗塑造了丁文江唯理論傾向。⁵¹ 費氏解說英國思想背景，與胡適的美國經驗相對照，反映丁、胡相信中國做得到和歐美一樣的「進步」，乃息息相關。

丁文江返國後，曾在上海南洋中學教書。⁵² 1913 年任北京政府工商部礦政司地質科科長，籌辦地質調查所（該所 1916 年正式成立，丁任首任所長）及設立地質研究班（後改為研究所），接收北大停辦地質門遺留之圖書標本。胡適引用地質學者翁文灝（1889-1971）的回憶描述丁氏教學作風：注重實地考察、小組工作，工作態度一絲不苟。⁵³ 丁讓畢業生進入地質調查所從事調查工作，再選

⁵⁰ 胡適，〈丁在君這個人〉，頁 11。

⁵¹ 費俠莉在結論指出，這是所謂「愛德華時代英國主流思想趨勢」。夏綠蒂·弗思著，丁子霖、蔣毅堅、楊昭譯，〈丁文江：科學與中國新文化〉，頁 22-28；Charlotte Furth, *Ting Wen-chiang: Science and China's New Culture*, pp. 26-33, 230.

⁵² 宋廣波根據一篇丁氏遺稿指出，序文投射丁文江意願：「行將出其所學以利吾國人，大則可以振學風、立學制，為吾國民立萬世求學之基；小亦可以居一校、執一科，為後學者升堂入室之階。」丁回國之初任教南洋中學有跡可循。丁文江遺稿，宋廣波整理考釋，〈送嘉定秦汾君東歸序〉，《中國科技史雜誌》，第 33 卷第 2 期（2012 年 4 月），頁 223、225。

⁵³ 胡適，〈丁文江的傳記〉，頁 32。這一回憶在〈翁文灝自訂年譜初稿〉再度出現：「其時丁文江自澳返京，授古生物學，並力主修改課程，加重野外實習，俾養成學生實地調查之能力，因此屢住西山，分組分地詳為視察。」丁、翁因此受邀勘查地質。翁心鶴、翁心鈞整理，〈翁文灝自訂年譜初稿〉，《近代史資料》，第 88 號（1996 年 5 月），頁 51。實地考察也是批判丁氏者願意承認丁對中國的兩大貢獻之一。葉青，〈丁文江底思想〉，《研究與

派優秀學生至國外留學，培養出謝家榮、王竹泉等人。該所於 1916 年歸入北大，易為地質學系。胡適先徵引葛利普（Amadeus William Grabau, 1870-1946）的讚譽，丁文江理解地質學科，「能在極短時期內樹立一個純粹科學研究的機構，作為中國地質學的建立和按步發展的領導中心。」再以陶孟和的話作結：「僅就他對於地質學的發展一端來說，在君足可以稱為學術界的政治家。」⁵⁴ 他特意強調丁氏成立純粹科學研究機構，不受中國政治外在風潮干擾；運用專業見識與通盤性的眼光著眼長期學術發展，訂立計畫，按部就班培養所需人材。如再將二者對照翁文灝言及丁氏設定調查所審查出版標準：「本慎重發表之宗旨，對出版極為審慎，寧遲勿濫。」⁵⁵ 這些書寫用意均在強調丁氏提升學術水準、就事論事之態度。

研究者注意到，胡適、徐新六約結識於 1918 年秋季，同年 11 月再透過徐引介，並親函梁啟超請見，展開交往，⁵⁶ 故胡適在《丁傳》稱於梁氏歐遊返國後結識徐、梁，⁵⁷ 屬記憶有誤。1920 年間，北大地質系畢業生應徵地質調查所考試，無法通過丁氏考核，丁便持成績和胡適商量，決定面見北大校長蔡元培（1868-1940）提出相關批評。由此顯示，丁、胡二人交往 1 年餘，志趣投合；一併展現丁以工作為重、尊重長輩，也勇於進言之個性。瑞典學者安特生（Johann Gunnar Andersson, 1874-1960）曾說丁文江：「也許不能算是一個典型的中國人，因為他太沈迷於工作，對他的合作同伴也太過於苛求，批評毫不留情，眼睛不容沙子，但是作為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員，他是一個閃光的代表人物。」⁵⁸ 胡適指出，他仍記得二事：一為請李四光（1889-1971）至該系任教；

批判》，第 2 卷第 3 期（1936 年），頁 97。

⁵⁴ 胡適，《丁文江的傳記》，頁 52-53。

⁵⁵ 翁心鶴、翁心鈞整理，〈翁文灝自訂年譜初稿〉，頁 53。

⁵⁶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頁 872-873。感謝一位匿名評審提醒，張朋園應是最先注意及此者。張朋園，〈胡適與梁啟超——兩代知識分子的親和與排拒〉，《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15 期（1986 年 12 月），頁 86。宋廣波據丁文淵回憶指稱，徐也是推薦丁加入梁氏歐遊團之人。宋廣波編著，《丁文江年譜》，頁 135。

⁵⁷ 胡適，《丁文江的傳記》，頁 60。歐陽哲生在《科學與政治——丁文江研究》（頁 200）仍持此說。

⁵⁸ 馬思中（Magnus Fiskesjö）、陳星燦編著，《中國之前的中國：安特生、丁文江和中國史前史的發現》（斯德哥爾摩：斯德哥爾摩東方圖書館，2004 年），頁 17，轉引自歐陽哲生，《科學與政治——丁文江研究》，頁 183-184。

二為請德國古生物學重量級學者葛利普來華任教，一併主持調查所古生物研究。胡適認為，丁文江聘請葛利普在華授課，也是為中國古生物學研究基礎教育紮根的貢獻之一。⁵⁹ 胡適再度巧妙徵引他人形容葛氏熱心青年教育之風，（「北大屢次索薪罷課的時候，他把地質系的學生叫到他家裡去上課。」）亦即胡適在學生運動展現態度：勸學生與教師冷靜面對時事，專心學術，胡適藉此宣示個人一貫立場。從新文化運動起，胡適長期作為中國學術界的代表人物，中日戰爭結束後提出 10 年內提升北大學術水準計畫，終究因國共內戰而夢碎，於學生運動各方態度深有所感。放在 1950 年代海峽兩岸領導人依舊相信群眾運動、動員等價值，胡適是「有所思」地期盼教師與學生能脫離外間紛擾（或被「動員」），專心作學問，藉此表達其有關中共從事群眾動員之觀感。

至於專業人才究竟如何看待政治局勢、政府與自身態度？丁文江的個案顯然是議政、參政經驗兼具，和胡適有部分相同經驗。胡適是基於知識分子的責任，由文化層面及於政治。文化是胡適的立身之本。⁶⁰ 由於丁文江與胡適是知友，共同參與《努力》、《獨立評論》之創刊及撰稿，以胡適的立場與觀察角度書寫丁氏議政，就是一項優勢。

丁文江留學日本期間，即閱讀《新民叢報》，日後加入梁啟超組織歐行考察團，自易為外間目為親「研究系」者，外間或云「一度為梁任公記事」。雙方情誼亦可由丁文江輓梁聯得知一二：「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在地為河岳，在天為日星。」⁶¹ 丁氏不諱言梁氏「是優秀的作家，但不是政治家。」⁶² 另有研

⁵⁹ 胡適，《丁文江的傳記》，頁 32-34。按 1920 年代以降至中國古生物地質學者有相當從學或受他指導。其地史及地層研究具有繼往開來的意義。參見王鴻禎，〈葛利普教授——中國地質學界的良師益友〉，收入王鴻禎主編，《中國地質事業早期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 年），頁 81-88。

⁶⁰ 沈衛威，《自由守望——胡適派文人引論》，頁 60。

⁶¹ 梁啟超記事說見慧，〈丁文江軼事〉，《申報》，1926 年 5 月 18 日，版 17。目為研究系分子見陶菊隱，《蔣百里先生傳》（臺北：文海出版社，1971 年），頁 74、77；彭鵬，《研究系與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以 1920 年前後為中心》（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3 年），頁 57；歐陽哲生，《科學與政治——丁文江研究》，頁 62-63、286-287。但如從梁氏自言歐遊團錄事為楊維新，即知記事說不實。丁氏短期教授梁氏英文為真。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頁 873、883。丁、胡或許如胡適所言，視梁為一位「老輩」。胡適，《丁文江的傳記》，頁 60。張朋園指出，梁、胡因為學術代溝致論辯立場有

究指出，研究系是性質鬆散的團體，丁氏屬於欽慕梁氏人格與學識而親近梁者，與梁氏的政治盟友林長民等疏離。⁶³ 如由梁啟超 1927 年的一封信觀之，此論確有幾分道理：「我們沒有團體的嚴密組織，朋友們總是自由活動，各行其是，亦沒有法子部勒他們（也從未作此想），別人看見我們的朋友關係，便認為黨派關係，把個人行動認為黨派行動，既無從辨白，抑亦不欲辨白。」⁶⁴ 換言之，當梁啟超等人尋求政治與文化盟友，拉攏在國外受教育的新知識分子（含胡適、丁文江），後者保持一定的游離色彩，在文化與私人友誼上雙方可親近，政治及學術主張則不然。但胡適大膽歸結「從沒有政治的關係，完全是友誼的關係」，⁶⁵ 有劃清界限之嫌，以及急於撇清丁、梁可能的政治（與文化）關連性。

1921 年丁文江離開地質調查所，投入官商合營北票煤礦總經理一職，與北京政府交通、外交各部、奉系軍閥有互動。同時，丁氏參與《努力週報》活動，熱心撰文。⁶⁶ 他不諱言，希望議政小圈子以同輩為宜，說話無拘束；對北大提出忠告，不欲因私誼影響立場。但任鴻雋（1886-1961）指出，蔡元培在資望與人品不比尋常，加入《努力》意義非常，亦不違背丁氏北大行政改革建議。⁶⁷ 丁於

異，但胡記得梁氏啟發新知之恩，與長幼有序的傳統規範，仍能為友。張朋園，〈胡適與梁啟超——兩代知識分子的親和與排拒〉，頁 107-108。

⁶² 上海市檔案館譯，《顏惠慶日記》（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1995 年），第 1 卷，頁 891，1919 年 7 月 29 日。顏惠慶歷任駐德國、丹麥、瑞典公使，1917 年抗議段祺瑞參戰辭職，住在丹麥。歐戰結束以顧問身分擔任巴黎和會中國代表團成員。

⁶³ 彭鵬，《研究系與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以 1920 年前後為中心》，頁 31-32。一位匿名評審惠示此問題之日文新著值得注意，見原正人，《近代中国の知識人とメディア、權力：研究系の行動と思想、1912-1929》（東京：研文出版社，2012 年），頁 100。

⁶⁴ 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頁 1111。

⁶⁵ 胡適，《丁文江的傳記》，頁 127。

⁶⁶ 丁氏自述一年半期間為《努力》寫了 123 欄，共 10 萬字。〈丁文江致胡適函〉（1924 年 1 月 13 日），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頁 229。丁文江與外交部接觸，如 1921 年 8 月下旬，丁送外交部長顏惠慶《鑛政管見》冊（1920 年 9 月 3 日呈報農商部部長及次長），回答顏有關鑛業法規與外資問題，並稱內附修改鑛業條例意見書（1918 年 12 月間丁文江撰）可為解決外資投資辦法參考。外交部於 8 月 26 日收到便箋與小冊。「送呈鑛政管見祈即鑒核由」，〈鑛政雜項〉，鑛務—鑛務雜項，《北洋政府外交部檔案》，檔號：03-03-043-02-014。按宋著及歐陽著均未提丁氏致顏函事。

⁶⁷ 〈丁文江致胡適函〉（1922 年 6 月 23 日），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頁 154。

1922 年表示：雖不組織政黨，卻得為將來組織政黨作預備。不然，政策是永遠組織不出來的。有幾種預備方法，「第一，是要保存我們『好人』的資格。」「第二，是要做有職業的人，並且要增加我們職業上的能力。」「第三，是設法使得我們的生活態度，不要增高。」「第四，就我們認識的朋友，結合四、五人，八、九人的小團體，試做政治生活的具體預備。」⁶⁸ 丁文江體認：人是政治的動物，專業人士不需自外或疏離政治，議政與參政均為可行。

丁文江更假託外國人之口，明言：「我覺得留學生是中國知識最完全的人，也是享社會上最大權利的人；所以我一面慶祝你的買賣成功，一方面希望你不要忘了政治。」⁶⁹ 胡適寫〈丁在君這個人〉時，亦注意到丁氏 4 個預備方法，前 3 條「是處處把私生活看作政治生活的修養」，丁也最討厭「靠政治吃飯的政客」。⁷⁰ 日後，胡適於《丁傳》提出，丁認為一班朋友「不應該放棄干預政治的責任」。他更坦言，丁氏〈少數人的責任〉「要認定了政治是我們唯一的目的，改良政治是我們的義務。」一語就是針對他的。⁷¹

丁文江在《努力週報》發表過軍事調查文章，友朋回憶反映丁氏熟悉軍閥個人資訊、教育、人脈、軍隊兵員素質、裝備等訊息，展現對議題之密切關注與分析能力，⁷² 這不同於胡適對時局的關切與理解。或許這就是丁氏何以出任淞滬督辦公署總辦，而胡在中日戰爭爆發前未任公職之差異。

丁文江之參政，一與他接觸直奉勢力，不以奉系中樞受舊派把持為然；⁷³ 二與江蘇地方反奉勢力中心人物陳陶遺（1881-1946）等人向孫傳芳推薦有關。孫

⁶⁸ 「好人」之語自有幾許道德意味，從中國傳統價值借鏡有自，強調專業人士「入世」則是關鍵。丁文江，〈答關於〈我們的政治主張〉的討論〉（續），《努力週報》，第 7 期（1922 年 6 月 18 日），頁 3。

⁶⁹ 丁文江，〈一個外國朋友對於一個留學生的勸告〉，《努力週報》，第 42 期（1923 年 3 月 23 日），頁 4。

⁷⁰ 胡適，〈丁在君這個人〉，頁 11。

⁷¹ 胡適，《丁文江的傳記》，頁 65-66。

⁷² 丁文江在《努力》發表軍事文章如〈軍事調查〉、〈直奉兩軍的形勢〉、〈廣東軍隊的概略〉、〈裁兵計劃的討論〉、〈湖南軍隊概略〉、〈山海關旅行見聞〉等。蔣廷黻，〈我所記得的丁在君〉，收入胡適等，《丁文江這個人》（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7 年），頁 177。

⁷³ 上海市檔案館譯，《顏惠慶日記》，第 2 卷，頁 428，1928 年 6 月 4 日。

在當時有一定實力、公眾形象尚可，喊起「保境安民」口號也能打動人心；⁷⁴ 三與丁氏認為「改良中國的政治（大體上是行政）決不能等到所謂時機成熟，有機會不可失機會。」⁷⁵ 丁常言政治笑話：中國的問題要想解決，非得書生與流氓配合起來不可。⁷⁶ 在幾分說笑之餘，亦是投射個人觀感。1924 年底，外間傳聞丁氏將擔任交通部長，但未成真。⁷⁷ 丁氏參政雖有幾許技術官僚意味，在各方政治勢力交會的上海活動，也必須承擔執行責任，無法保持中立。友人敘述意在強調丁氏技術官僚色彩，於丁協助孫傳芳治理上海部分未置一詞，或強調維持孫傳芳「中立」立場，與國民革命軍最初策略相合等語，⁷⁸ 實有迴護之意。胡適徵引入文，也顯示他願意相信及支持丁氏友好之說。如從時勢發展與時論分析言，孫傳芳選擇中立係因避免與南方立即作戰，雙方疑忌與攸關利害，終將一戰，⁷⁹ 實無須丁居中協調，擔任核心智囊。學者已根據丁氏書信理出丁任淞滬督辦公署總辦工作，包括在上海組織新聞檢查、對外國使領館交涉以期阻止革命勢力取得軍事

⁷⁴ 胡適，《丁文江的傳記》，頁 107。1926 年在歐洲留學的傅斯年，日後回憶當時觀感，「孫亦一無知軍閥，然比之二張則差強。」傅孟真，〈丁文江一個人物的幾片光影〉，頁 10。梁啟超也談起 1926 年孫、蔣對抗前的孫氏形象：「孫在北洋軍閥中總算比較的好，江浙地方形象亦總算比較的清明，他們（指丁文江、蔣百里）與孫合作並不算無理由。」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頁 1111。

⁷⁵ 傅孟真，〈丁文江一個人物的幾片光影〉，頁 9。

⁷⁶ 蔣廷黻，〈我所記得的丁在君〉，頁 181。賈祖麟（Jerome B. Grieder）提醒過，胡適與軍閥並非在政治上全然對立，與段祺瑞、吳佩孚有過互動。張朋園深入指出，新秀胡適為各政治勢力拉攏，勢屬當然，但胡適在五四之後聲名大噪，加以個人政治信念與個性，不願輕易投入任何陣營。Jerome B. Grieder, *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Liberal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10-1937*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202; 張朋園，〈胡適與梁啟超——兩代知識分子的親和與排拒〉，頁 107。

⁷⁷ 顏惠慶對此解讀為，丁在等待下一個機會。上海市檔案館譯，《顏惠慶日記》，第 2 卷，頁 193，1924 年 12 月 8 日。按顏為庚子賠款會暨政治社會科學學會董事暨董事長、關稅特別會議中國代表。何漢威指出，上海檔案館翻譯《顏惠慶日記》1925-1926 年間多處將顧維鈞誤譯為丁文江（均縮寫 V. K）。何漢威，〈（書評）宋廣波編著，《丁文江年譜》〉，《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65 期（2009 年 9 月），頁 159-160。

⁷⁸ 傅孟真，〈我所認識的丁文江先生〉，頁 5；董顯光，〈我與在君〉，收入胡適等，《丁文江這個人》，頁 174-175。孫曾公開對外間表示，與丁文江並無淵源。〈孫傳芳昨就淞滬督辦職典禮隆重〉，《申報》，1926 年 5 月 5 日，版 13。

⁷⁹ 布雷，〈北伐軍發展與孫傳芳〉，《國聞週報》，第 3 卷第 27 期（1926 年 7 月 18 日），頁 5-6；慎予，〈東南有犧牲必要乎？〉，《國聞週報》，第 3 卷第 32 期（1926 年 8 月 22 日），頁 2。

物資、謹慎處理內部可能不穩人士，防範資助革命勢力、爭取並籠絡北洋海軍領導人、資助劉崇佑（1877-1941）赴日探詢日方意向、阻止廣東通貨在上海流通、截查郵電等。⁸⁰ 丁氏壓制彭湃參與領導上海工運，使他站在工運對立面，廣東甚有自行宣布處丁死刑之言；丁也奉命查封「十五個國民黨的機關」，⁸¹ 很難說丁氏未與「革命」一方對立。在 1950 年代的「批胡運動」中，支持共產革命者依舊認為：只要北洋政府批准出版《努力》，刊物即是軍閥的「同盟」，成為「反赤」的工具，相悖離於「革命」與「人民」。⁸² 這都是帶有敵我對立價值觀的論點，亦認定丁氏等同於軍閥「同路人」。

胡適於 1925 年 10 月間從北京到上海治病休養，1926 年 5 月中旬短暫返京津一帶，7 月 22 日從哈爾濱啓程取道蘇俄、法國赴英國開會，後至美國訪問，直至 1927 年 5 月中旬由日本神戶啓程，同月底返回上海。⁸³ 丁、胡在中英庚款顧問委員會之密切接觸與交情，亦令支持廣州政府之胡適友朋側目。如 1927 年顧頡剛暗指丁氏為「過時的新人物」，「未必盡是壞人，但他們確自有咎取之道」，建議胡適「從此與梁任公、丁在君、湯爾和一班人斷絕了吧」。⁸⁴ 顧頡剛之語突顯時人（特別是支持革命立場者）對丁文江持負面觀感，使顧勸胡適愛惜令名，勿結交「舊人」。事實顯示，丁、胡交情並不因為顧之規勸產生變化。

⁸⁰ 何漢威，〈一九二六年淞滬督辦公署總辦任內的丁文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81 卷第 1 分，頁 76-78。

⁸¹ 工運部分詳見何漢威，〈一九二六年淞滬督辦公署總辦任內的丁文江〉，頁 61-67；〈張慰慈致胡適函〉（1926 年 10 月 15 日），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頁 404。

⁸² 參見侯外廬，《揭露美帝國主義奴才胡適的反動政治面貌》，頁 34-36。工具之說，如吳佩孚花錢辦理之傳言。〈丁文江致胡適函〉（1924 年 9 月 12 日），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頁 261。

⁸³ 參見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 2 冊，頁 616、629、642，1925 年 10 月初、1926 年 5 月中、1926 年 7 月裏記載。

⁸⁴ 〈任鴻雋致胡適函〉（1927 年 1 月 3 日）、〈顧頡剛致胡適函〉（1927 年 2 月 2 日）、〈顧頡剛致胡適函〉（1927 年 4 月 28 日），三函均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頁 416、426、429。顧氏態度並非孤例。梁啟超也坦承 1927 年 5 月間，梁思忠「思想一天天趨於激烈（按：三子梁思忠留美，欲棄學返國參加革命軍北伐），而且對於黨軍勝利似起了無限興奮，這也難怪。……想一個新局面發生，以為無論如何總比舊日好，雖以年輩很老的人尚多半如此，何況青年們！」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頁 1126。

如將「革命」標榜為「新」，丁文江不盡贊同革命，趨近於「舊」。丁氏辭職之前，並不諱言其「權衡輕重」地選擇「反急進」：

維持政局當然不是可以單靠戰爭的。但是此次孫（傳芳）之用兵，實在出於不得已。……國民黨方面則完全取一種急進的政策，在上海方面造謠式的宣傳，無意識的暴動，不一而足。我預料他就是能將孫打倒，內部必有問題，而且恐怕要為土匪式的奉軍來造機會。這是最愁的一件事。因為您知道我不是迷信反赤的人，就是孫也不是迷信反赤的人，無奈過激派與極端反動派倒可以聯合，溫和派的人則反是孤立，這也許是歷史上公例，不能避免的。⁸⁵

胡適歸結道，教育背景影響丁文江的政治思路，終究是英國「自由教育的產兒」，「不能相信一切破壞的革命的方式」。用暴力的革命總不免是「放火」，更不免要容納無數「趁火打劫」者。只能期待「少數裡的少數，優秀裡的優秀」擔負改良政治之責，不能提倡大革命。⁸⁶ 言外之意即指丁不可能支持共產黨人。這是1930年代的胡適觀點，已和他1920年代中期一度認為廣州政府必定勝利、支持國民革命掃除軍閥、更替政權的觀點不同（胡適將國民革命納入中國文藝復興運動脈絡下理解）。⁸⁷ 胡適此一分析基調延續至冷戰年代。梁啟超也表示「打倒萬惡的軍閥，不能不算他們（筆者按：國民黨人）的功勞，我們想做而做不到，人家做了當然贊成，但前途有光明沒有呢？這是絕對的沒有。他們最糟的是鼓動工潮，將社會上最壞的地痞流氓一翻，翻過來做政治上的支配者，安分守己的工人

⁸⁵ 這有異於胡適當時對南方政府一定同情且支持地態度。〈丁文江致胡適函〉（1926年11月28日），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頁409-410。「權衡輕重」見傅孟真，〈丁文江一個人物的幾片光影〉，頁7。

⁸⁶ 胡適，〈丁在君這個人〉，頁13。近年有中國學者承認，丁文江訂立收回上海會審公廨章程是朝向收回司法主權努力之過渡辦法，是「盡可能地做一些事」。耿雲志，〈序〉，宋廣波編著，《丁文江年譜》，頁5。

⁸⁷ 1990年代前期，白吉庵審慎地指出，胡適面對1927年前後中國政局，是藉由對兩位老國民黨人（蔡元培、吳敬恒）認識，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場與支持態度。白吉庵，《胡適傳》，頁261。羅志田從較長時間觀察，提出鮮明的觀點。羅志田，〈個人與國家：北伐前後胡適政治態度之轉變〉，《亂世潛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頁235-239之詳盡分析。羅氏進而指出，胡適觀感轉變，與南京清黨有關，羅志田，前引文，頁246-249。

們的飯碗都被那些不做工的流氓打爛了。」⁸⁸ 梁、丁「反急進」之公約數，即憂慮革命、破壞將導致之社會失序。

但丁文江、梁啟超「反急進」觀點並非知識人的普遍共識。丁文江過世後，一位社會主義者就對丁氏不信「革命」與「進步」價值不以為然；這位作者以革命、進步價值為貴，批判丁文江思想「落後」與「妥協」，好發議論僅為吸引統治者注意，貶斥為既得利益擁護者。⁸⁹ 視丁文江為既成利益秩序擁護者，實是小覷或低估丁氏信念與政治思想內涵。綜觀胡適描述丁文江與政治環境，仍然承認北京政府統治的合法性，尊重史實。胡適並未沿用進步者必勝、保守者必敗論述，以及套用「進步論」將軍閥等同於保守落後。這或與胡適身在美國，使他不受國共革命史觀羈絆有關。

丁文江決定個人政治出處顯示，在時局不可為之外，他有自主決定力，展現人格特質。丁氏在 1926 年出任淞滬督辦公署總辦時，報刊已讚譽他「好學耐勞」非「時下之浮滑留學生可比」、「潔身自好」。⁹⁰ 丁氏辭職令好友徐新六深感慶幸，徐趁機勸丁「埋頭讀經濟書籍」，於經濟理論外宜研究「遍及財政、幣制、賦稅、人口各種應用問題」。⁹¹ 丁離滬至平津一帶，8 月間至大連居停。丁氏短暫從政，不藉職權營私，又負擔家族開支而生活困頓。⁹² 但丁氏不以為苦。他針對南北局勢就事論事，批評北方人於寧滬分立「大高其興」是「至為可笑」。丁更關注日本在中國東北與內蒙的侵略野心與經濟勢力擴張，認為這才是

⁸⁸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頁 1110。

⁸⁹ 葉青使用這類文字：「『實際主義者』常常是沒有理想、沒有未來而只對現狀視為當然呢？」「總之，誰勝利就跟著誰走。」「『實際主義者』雖然擁護現實，但是在勝利者沒有用他時，他也是不少話說的。」葉青，〈丁文江底思想〉，頁 93-95。

⁹⁰ 慧，〈丁文江軼事〉，《申報》，1926 年 5 月 18 日，版 17。

⁹¹ 〈徐新六致胡適函〉（1927 年 1 月 12 日），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頁 420。

⁹² 胡適，〈丁文江的傳記〉，頁 119-122。黃炎培協助丁文江在大連租屋，相關事見黃炎培原著，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整理，《黃炎培日記》（北京：華文出版社，2008 年），第 2 卷（1918.2-1927.7），頁 320、322-324，1927 年 7 月 13、21、22、24、25、27 日。

真正可怕的問題。⁹³ 丁氏冷靜論事的態度，使後世研究者讚賞他有「政治家風度」。⁹⁴

胡適受限於史料，只能就友人回憶部分闡述丁文江的去就問題。胡以爲丁面臨困難的局勢（國民革命軍北伐，11月起是孫、蔣軍事對立），援引董顯光（1887-1971）回憶，指丁「同情革命軍」，終究選擇主動辭職。⁹⁵ 這段論述單以董顯光「同情革命軍」立論，難脫以「孤證爲主證」之嫌。即便胡適援引劉崇佑對劉、孫會談的回憶，亦難以認定丁文江同情革命軍。丁氏主動遠離是非，與胡適在中日戰爭期間從駐美大使卸職經歷，⁹⁶ 讓胡對丁拿捏去就分寸感到「心有戚戚焉」。胡、丁從政期間，並未牟取一己或家族金錢利益，爲從政者樹立基本規範，亦是胡關注之價值觀。胡適娓娓道來個人小事，背後透露一種價值觀，不能以小視之，這也是胡適欲警醒世人與從政者之道德教訓。

肆、學人、政治邊緣人

胡適寫作《丁傳》的外在環境，是國際冷戰、自由與共產對抗、海峽兩岸國共對峙、中共發動批胡運動的局面。胡適在《丁傳》專章展現丁氏政治理念，自有理由。從 1930 年代日本侵華「國難」走過來的胡適，如何書寫同代人丁文江面臨「國難」之議政與活動，即值得關注。

⁹³ 〈丁文江致胡適函〉（1927年8月16、26日、無日期信），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頁440、441、454。

⁹⁴ 羅志田，〈個人與國家：北伐前後胡適政治態度之轉變〉，頁271。

⁹⁵ 胡適，《丁文江的傳記》，頁115-119。董顯光日後以英文撰寫《蔣介石傳》，出任新聞局長、中華民國政府駐美大使。

⁹⁶ 王世杰提及，胡適勸解中方，應諒解美方政府運作，以中國政府「無人為諍言為可慮」，辭去大使意志堅決。胡、蔣對美國定位與立場歧異，顯非一時。1942年7月1日，〈王世杰日記〉，近代史數位資料庫，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年吳景平從多方面史料比對後，也得出中國對美國戰略利益、國家基本價值、體制及其運作等未盡瞭解、造成外交定位問題不免錯位。吳景平，〈蔣介石與戰時美國對華財經援助〉，《史學月刊》，2011年第1期（2011年1月），頁70-79。

面對「國難」，所謂「亂世之飯桶」的知識分子眼見學術救國、文藝復興、科學建國目標將被毀滅，能夠做些什麼？在民族主義氣氛濃厚環境下，成立《獨立評論》就是「在那個無可奈何的局勢裡認為還可以為國家盡一點點力的一件工作。在這一「小冊子雜誌的黃金時代」，刊物經費從籌備起至發刊頭兩年，均靠社員捐款，在排字工資、紙價不貴、不發稿酬、節省人事開支狀況下，得以維持。⁹⁷ 重要作者之一的翁文灝從民族主義角度歸結刊物創辦與言論方針：

對於當時大局，重在喚起人心，共保國土，決不可輕中日本傳言，半壁自安，放棄北部。對於國家前途，則主張實行民主政治，經濟建設，發揚國力，保國疆圖。對於日本，則以地處近鄰，不宜隔閡，節敘概要以為紹介。有時著論警告華北大員，須知國本所關，守土有責，決不可以石敬瑭、張邦昌自命，民監天監，命茲在茲。其時北平特設委員會，以婉委態度，應付日人，空氣正趨沉靡，此刊發于北平，公正立言，閱讀者眾，於朝野心理頗有影響。⁹⁸

按翁氏書寫自編年譜時係中共治下，斥責蔣介石破壞國共合作局勢，強調對抗日帝國主義侵略的價值，提及《獨立評論》成立經歷，亦代表刊物具有時代正面意義、「強調（中華）民族氣節」作用。胡、翁之敘述相同，絕非巧合。

丁文江自嘲為「飯桶」，並未因從政挫折而對現實政局灰心，重執筆論議時政，成為《獨立評論》的原始社員，文章發表量僅次於胡適。⁹⁹ 丁氏不再列名於政府通緝犯亦有助其安心議政。¹⁰⁰ 胡適順道解釋戰後不願主動再辦刊物，就是因為「貨幣價值天天變動」，文人「賣文吃飯」，排字工資高漲，辦不了真正「獨立」——財務獨立——的刊物。¹⁰¹ 一個真正言論與立場獨立的刊物，必須做到財務自主，不受制於人及政府，胡適顯然是意有所指，一併蘊含胡對現世政治之關懷。但是，《獨立評論》創刊，也令外間懷疑刊物參與者是否「正在成立一個

⁹⁷ 參見胡適，《丁文江的傳記》，頁 142-144。

⁹⁸ 翁心鶴、翁心鈞整理，〈翁文灝自訂年譜初稿〉，頁 62。

⁹⁹ 陳儀深，《〈獨立評論〉的民主思想》（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9 年），頁 64。翁文灝也是原始 11 社員之一。

¹⁰⁰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丁一度名列通緝犯，至 1931 年政府大赦政治犯為止。劉厚生，〈《丁文江傳記》初稿〉，收入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 9 冊，頁 222。

¹⁰¹ 參見胡適，《丁文江的傳記》，頁 144。

新政黨」？從蔣廷黻（1895-1965）需透過回憶錄闢謠即知一二。¹⁰²《獨立評論》論議時政，並未免除地方勢力干涉。諸如首都憲兵司令部郵電檢查扣留刊物第 81 號、廣東不許刊物入境行銷、冀察政務委員會甚至下令停刊，4 個多月後再行復刊。復刊的刊物淡然地表示「『獨立』還是原來的『獨立』」，但從遭受停止郵遞、處分《大公報》道賀語，擺明刊物的抗議精神：「這樣為正義受損失，是一個輿論機關最光榮的事。」¹⁰³刊物言論絕不以維護既得利益為考量。

胡適注意到，丁文江撰寫〈蘇俄遊記〉時，曾與蘇俄國內優秀地質專家作意見交流，蘇俄政府關切地質調查，包括地質開發調查組織以中央為主的「托辣斯」、提升地質圖繪製比例、增加人員薪水及教育學校設置。¹⁰⁴丁氏藉此指出蘇俄政府重視國家戰略物資、重視相關教育的培訓投資、政府如何有效使相關工作運作，期望中國政府有以取法。胡適並未提及，丁氏關注蘇俄規劃地質調查，除專業興趣使然，可能亦因 1932 年 11 月 1 日起參加國防設計委員會。按該機構為資源委員會前身，在調查、統治等共 5 處外，設有冶金、礦業、電力 3 室。據日後錢昌照（1899-1988）的述評與分析提及，丁氏參加該會，「他認為要進行國防設計工作，必須了解全國資源情況，在丁先生的大力協助下，由國防設計委員會出錢，地質調查所出人，做了不少工作。」¹⁰⁵知識人融合學術訓練與當下情境關懷，令丁文江關注並分析蘇俄相關機構如何處理地質調查與資源運用，以期作為中國資源統籌與規劃國防工業之參考。

相關史料顯示，丁文江與國民政府政治軍事權力核心接近，以專業知識備供諮詢顧問，始自 1932 年，與翁文灝獲得蔣介石（1887-1975）延攬有關。翁氏提到，1932 年間透過錢昌照引介，翁赴牯嶺與蔣介石會談，佩服蔣願保全國家、求才建國，便進言延攬胡適、張伯苓、丁文江、顧振、徐新六、吳鼎昌、張嘉

¹⁰² 蔣廷黻著，謝鍾璉譯，《蔣廷黻回憶錄》（臺北：傳記文學社，1979 年），頁 145。

¹⁰³ 陳儀深，《〈獨立評論〉的民主思想》，頁 10-11。

¹⁰⁴ 胡適，《丁文江的傳記》，頁 158-160、162-163。

¹⁰⁵ 錢昌照，〈紀念丁文江先生百年誕辰〉，收入王鴻禎主編，《中國地質事業早期史》，頁 8。錢昌照之言可透過蔣廷黻回憶佐證，錢對發展中國天然資源倍感興趣。蔣廷黻著，謝鍾璉譯，《蔣廷黻回憶錄》，頁 145。值得注意的是，蔣介石電致錢昌照時，均稱呼錢氏教育部次長公職。

璈、蔣廷黻、周炳琳、蔣夢麟、周鯁生、盧作孚、范旭東等人。¹⁰⁶ 若由蔣氏資料推估，會談是在該年 6 月 16-19 日間，共 4 日，翁針對中國經濟（與錢昌照共講）、煤鐵礦業、各省礦質分量、中國東北與西北農產地分量等做專題講論。後 3 日講論，讓蔣深感「翁實有學有識之人才，不可多得也。」蔣自認，該年得翁文灝最幸：「翁最有閱歷，亦有能力，可喜也。」¹⁰⁷ 這些讚美詞在學識見解外，翁氏乃寧波籍，與蔣小同鄉也有些關係。由錢昌照、翁文灝向蔣介石雙重推薦丁文江確有可能。按 1931 年底，熊希齡等人組織國難救濟會，呼籲國民黨解除黨禁、推動制憲。1932 年 1 月 14 日，行政院公布國難會議會員 189 人。部分北方與會者交換意見，以為會議不當以討論中日問題為限，「但也不應對國民黨採取敵對態度，當以非革命的方法求得政治的改善。」¹⁰⁸ 該年 4 月 7-14 日間召開國難會議，為丁文江和南京政府成員正式接觸之始。至於丁、蔣見面且深談，是在 1932 年 9 月 10 日。蔣提及「丁在君、陶孟和、葉叔衡皆有為之士也」。次日，丁謂「政治須急求公開，其言甚善也。」¹⁰⁹ 顯然蔣對丁的印象頗佳。相關史料出現，已可修正前人概略以 1932 年春起開始接觸翁文灝等知識人之說。¹¹⁰ 蔣、丁正式見面後半年內，後者出任國防設計委員會委員。次年，丁獲聘為行政院農村復興委員會委員。¹¹¹ 翁、丁獲聘為政府專業顧問，論者視為向南京爭人

¹⁰⁶ 翁心鶴、翁心鈞整理，〈翁文灝自訂年譜初稿〉，頁 62-63。李學通注意到，因為翁任國防設計委員會秘書長，胡適也是該委員會委員，握有密碼本，為相關人士與蔣的聯繫「躍上新台阶」。李學通，〈胡適與翁文灝〉，《科學文化評論》，第 3 卷第 1 期（2006 年 2 月），頁 109。

¹⁰⁷ 黃自進、潘光哲編，〈蔣中正總統五記·愛記〉（臺北：國史館，2011 年）〔即原王宇高、王宇同編，〈蔣中正總統愛記〉〕，頁 99、102，1932 年 6 月 19 日、7 月 25 日。

¹⁰⁸ 〈行政院公佈國難會議名單，網羅各方特殊人物，秘書處已開始辦公〉，《申報》，1932 年 1 月 22 日，版 3。北方人士餐聚，見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 6 冊，頁 628，1932 年 1 月 27 日。

¹⁰⁹ 王正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 16 冊（民國 21 年 8 月至 9 月）（臺北：國史館，2004 年），頁 329，1932 年 9 月 10 日；黃自進、潘光哲編，〈蔣中正總統五記·愛記〉，頁 106，1932 年 9 月 11 日；王正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 16 冊，頁 332，1932 年 9 月 11 日，〈事略稿本〉改為「客云政治公開」。按陶孟和為陶履謙弟，祖籍浙江紹興，生於天津；葉為浙江杭州人，兄為浙江興業銀行董事長葉揆初。丁與蔣同年、有過日本經歷，也可算有「二同」。

¹¹⁰ 許紀霖，〈尋求意義：現代化變遷與文化批判〉（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7 年），頁 147-148。

¹¹¹ 張朋園、沈懷玉合編，〈國民政府職官年表〉（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

權、要法治的自由知識分子開始認同政府合法性之論，¹¹² 亦有根據。這也反映各股政治勢力正在拉攏知識分子，以為競逐權力資本，以及知識分子游離其中的現象。¹¹³

自此時起，蔣介石、丁文江持續接觸；胡適在《丁傳》卻是淡化丁氏政治邊緣人的形象。胡適只承認，日本攻擊熱河事件於 1933 年 3 月 10 日夜與丁、翁文灝見張學良，3 月 13 日到保定見蔣介石。¹¹⁴ 錢昌照指出另一次接觸，是丁在 1933 年國防設計委員會在廬山召開的委員會會議中主張用科學武裝軍隊，黃埔軍校學生應該通曉科學。要蔣以英國海軍最好的醫生是海軍軍醫，最好的科學家是軍隊科學家為榜樣。此議讓蔣大為賞識。丁、蔣 2 人對話均談論政治，既不敷衍也不邀寵。¹¹⁵ 錢氏陳述重點有二：一為丁持「科學是國防實力後盾」之實用價值見解，打動了蔣介石；二為丁在 1930 年代前期仍為政治邊緣人。如將國史館庋藏檔案與時人回憶相互印證，將可知蔣、丁實際接觸遠多於回憶錄及胡適描述。

蔣介石在 1932 年起經常透過錢昌照、翁文灝和學人接觸聯絡、約晤會談與聽講。¹¹⁶ 在 1934 年蔣邀約丁、胡等學者會談前，蔣更提出一定細節：談話 2-3

年），第 1 冊，頁 439-442。

¹¹² 許紀霖，《尋求意義：現代化變遷與文化批判》，頁 148。

¹¹³ 周德偉（曾為改組派顧孟餘幕僚）回憶，將顧孟餘、王世杰、周鯁生等人視為親政學系章士釗者。周氏亦稱顧結納北京、武漢、中央各大學學人，胡亦在內。但胡「重實力，頗嫌汪太空洞，與顧若即若離，顧亦不介意，但胡一時亦無力接近政權。」顧薦胡適就教育部長，胡力辭不就，顧改請周鯁生，周亦堅辭，終以王世杰為教育部長，段錫朋為政務次長。周德偉、周德偉先生回憶錄編纂小組，《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臺北：遠流出版事業公司，2011 年），頁 330、284、324。周氏回憶國民黨其他政治勢力亦藉拉攏知識界人士當作競逐權力之資本。

¹¹⁴ 胡適，《丁文江的傳記》，頁 154。

¹¹⁵ 錢昌照，《錢昌照回憶錄》（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8 年），頁 40、148。

¹¹⁶ 如「蔣中正電翁文灝轉告胡適諸事北上後面談並代約丁文江一晤及蔣中正電楊永泰擬即經漢北上請準備偕行」（1933 年 3 月 5 日），〈一般資料—民國二十二年（一）〉，《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200-00071-001；「蔣中正電錢昌照代約胡適丁文江在南昌會敘」（1934 年 2 月 7 日），〈籌筆一統時期（一〇三）〉，《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10200-00103-028；「蔣中正電錢昌照四月初請胡適丁文江與蔣廷黻同時來贛」（1934 年 3 月 5 日），〈特交文卷—親批文件—民國二十三年一月至民國二十三年四月〉，《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70100-00033-050；「蔣中正電錢昌照與翁文灝丁文江

次，每次 1 小時，題目可商。¹¹⁷ 此舉使學者談話更具備演講形式。值得注意的是，胡適在寫丁傳時僅提熱河問題之會見，更關注丁氏學人議政，強調以學人始終，未提丁氏為蔣講學與顧問就直堪玩味。特別是胡、蔣曾「談教育方針與制度，（按：胡）主張持久，以為利不十則不變法云。其意余甚以為然，其人似亦可交也。」¹¹⁸ 難道胡已印象澹漠？以胡、丁交誼深厚，胡也理解丁高度關懷現實政治與參政以建國之忱，何以忽略？胡適難以推託於資料不足。

蔣介石意欲用丁文江，實有醞釀。他曾考慮並推薦丁氏主掌南昌行營設計處、南京市長、實業部長。¹¹⁹ 丁無法出任南京市長，非國民黨籍為一因，汪兆銘（1883-1944）即坦言丁「顧慮市黨部決不肯就」，¹²⁰ 也不能忽視外間及國民

酌商行營政治與經濟設計委會人選」（1934 年 4 月 15 日），〈籌筆—統一時期（一一二）〉，《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10200-00112-006；「蔣中正電翁文灝到京與丁文江會商以後經濟政策並制定方案」（1934 年 11 月 6 日），〈革命文獻—財政經濟〉，《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20200-00033-052；「蔣中正電翁文灝丁文江已抵成都望六月十日前到蓉」（1935 年 5 月 27 日），〈籌筆—統一時期（一四〇）〉，《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10200-00140-045。

¹¹⁷ 「蔣中正電錢昌照四月初請胡適丁文江與蔣廷黻同時來贛」，〈親批文件—民國二十三年一月至民國二十三年四月〉，《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70100-00033-050；周美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 25 冊（民國 22 年 3 月至 4 月）（臺北：國史館，2006 年），頁 60，1934 年 3 月 5 日。

¹¹⁸ 黃自進、潘光哲編，《蔣中正總統五記·愛記》，頁 108，1932 年 12 月 2 日。《胡適日記》特地記載該日談話內容，重點大致無差。11 月 28 日「此是我第一次和他相見」。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 6 冊，頁 632、635-636，1932 年 11 月 28 日、12 月 2 日。

¹¹⁹ 行營設計處見「蔣中正電錢昌照請翁文灝等代聘丁文江楊端六主持行營設計審核兩處」（1933 年 7 月 6 日），〈籌筆—統一時期（八十七）〉，《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 002-010200-00087-044；南京市長見「蔣中正電汪兆銘丁文江與馬超俊亦可為南京市長人選」（1935 年 3 月 23 日），〈特交檔案—一般資料—民國二十四年（十八）〉，《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80200-00216-036；實業部長見高素蘭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 31 冊（24 年 5 月至 24 年 7 月上）（臺北：國史館，2008 年），頁 51，1935 年 5 月 11 日。

¹²⁰ 「汪兆銘電蔣中正丁文江顧慮市黨部決不肯就已徵得馬超俊同意今日提出院議通過」（1935 年 3 月 27 日），〈特交檔案—一般資料—民國二十四年（十九）〉，《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80200-00217-013。國民黨南京市黨部為 CC 派掌握，丁非國民黨籍，在北洋政府做過事，與梁啟超接近，均為原因。歐陽哲生也指出，不加入黨派活動，缺乏現實政治力量支撐，丁至多是關心政治的公共知識分子，或者參與政治的精明技術官僚。歐陽哲生，《科學與政治——丁文江研究》，頁 78。

黨視丁爲「研究系」之影響。如蔣介石令錢昌照聯繫「詠霓、在君二先生酌定」行營政治設計委員會各科專理，¹²¹ 就爲職權內事，蔣氏用詞顯示極力優禮翁、丁，未見部屬意味。正因蔣介石示丁氏以敬重，所謂「政學系」之熊式輝（1893-1974）函請蔣親自、或轉請翁文灝勸丁任南昌市長及江西省政府委員（負責礦業開發），「請委座賜予成全」。對熊而言，自江西省黨部擇人「恐滋不平」，任用丁氏可收權力平衡之效。蔣以「丁必不來」回拒。¹²² 熊氏舉動與蔣氏回應，顯示蔣不欲運用丁氏以平衡黨內派系，也已思量如何運用丁氏長才。

劉厚生（1871-1962）不諱言地表示丁不會出任部長：

文江對於政治興味還是一樣的濃厚。但是他在民國廿五年（1936 年）死前的幾個月，我與他在上海見面，他對我透露，蔣介石要找他出來做什麼部長，正在竭力躲避。他說蔣介石決不是可與共事的人，還不如孫傳芳之能信任其部下，我已吃過苦頭了，不能隨便出來。¹²³

上述事情可能是指 1935 年 12 月 7 日起蔣介石接任行政院長，籌組內閣時擬聘丁文江爲鐵道部長。蔣有此考量，與 1931 年起中國成立管理中庚庚款董事會，丁文江、胡適均參與董事會教育部門；鐵道部於 1933 年 7 月 18 日與基金會簽訂完成粵漢鐵路總契約借款，計劃在 4 年內完工，是中庚庚款董事會最大的一筆借款。¹²⁴ 蔣介石或許考量借重丁文江督責其事，以協調中央與各省事務。按 1934 年 11 月間，蔣介石、汪兆銘即磋商以丁文江等 5 人爲鋼鐵廠兼司籌備會委員，以丁爲主委。翁文灝也提及，蔣力約丁爲資源委員會常務委員及中央鋼鐵廠

¹²¹ 周美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 25 冊，頁 469，1934 年 4 月 15 日。

¹²² 「熊式輝函蔣中正江西復興計畫及政治之整理正從事調製圖表報告及請任丁文江爲南昌市長兼籌畫礦產等並附蔡廷鍇函之節錄」（1932 年 11 月 14 日），〈一般資料—黨國先進書翰（二）〉，《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200-00620-040；「熊式輝電蔣中正是否勸丁文江屈就江西省委或由蕭純錦等擇一充任」（1933 年 3 月 15 日），〈一般資料—民國二十二年（二）〉，《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80200-00072-151。熊式輝著，洪朝輝編校，《海桑集》（紐約：明鏡出版社，2008 年）隻字未提。

¹²³ 劉厚生，〈《丁文江傳記》初稿〉，收入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 9 冊，頁 222。

¹²⁴ 沈雲龍訪問，林能士、藍旭男記錄，《凌鴻勛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 年再版），頁 100-102。

籌備主任，丁意在皖南馬鞍山設鋼鐵廠，盼望開灤礦務局投資。丁與開灤礦務局總經理顧振友誼甚篤，甚得中、英雙方信任。¹²⁵ 翁言顯示，蔣約請丁參與擘劃國家資源開發及證實丁獲得中、英雙方信任。唯丁氏努力多時無法見效，此因國內金融恐慌籌資困難，也無法發售債券籌資；擬定以開灤煤礦資產作為財產擔保於倫敦借款，又因礦區處於戰區而無人接洽。丁文江縱使專力辦事、全力以赴，也無奈地向蔣表示設廠計畫推遲：「惟目睹京滬危機情形，向財政金融當局催逼，徒增困難，於事無補，故不得不稍從緩進。」¹²⁶ 丁氏勇於任事的個性，透過函件一覽無遺。

翁文灝回憶不同，謂丁文江自蘇返國後，意欲從事國家建設：

丁君對科學固具有熱心，而於國事尤宏抱志願，但以為一居此職（按：中央研究院總幹事），則須以機關地位為先，不便輕發猛進言論，因此初期遲疑，未遽允諾，嗣因院友堅邀，勉允擔任，因即移居南京，全神任事。

因粵漢鐵路南北接軌，需煤供應，親往湖南考察湘潭等處煤礦。余電請返京，乃彼行抵衡陽，受煤氣暈厥，為患甚重。余偕戚壽南醫師飛往看視，確難治事，乃改任張嘉璈。¹²⁷

如由凌鴻勛〈悼丁在君先生〉當下回憶文，既與翁氏回憶較為相近，也反映丁在愛國心與責任感的驅使下，仍有可能為了做事而參政。凌文提及丁氏在湖南考察途中，談論煤礦開發之餘，綜論國是，「以為吾輩亟宜有以自奮，趁此壯盛

¹²⁵ 周美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 28 冊（民國 23 年 9 月（下）至 12 月）（臺北：國史館，2007 年），頁 399，1934 年 11 月 1 日；「汪兆銘電蔣中正可否由政府聘丁文江等為鋼鐵廠兼司籌委會委員並以其為主委及蔣中正回電贊同」（1934 年 11 月 16 日、11 月 28 日），〈特交檔案—一般資料—民國二十三年（五十）〉，《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80200-00192-060；翁心鶴、翁心鈞整理，〈翁文灝自訂年譜初稿〉，頁 67。

¹²⁶ 「丁文江電蔣中正報告鋼鐵廠事進行經過情形」（1935 年 7 月 17 日），〈特交檔案—一般資料—民國二十四年（四十一）〉，《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80200-00229-095。汪敬熙說，丁做事向來以事業為主體，不以應付人為中心。汪敬熙，〈丁文江先生〉，《獨立評論》，第 188 號（1936 年 2 月 16 日），頁 37。

¹²⁷ 翁心鶴、翁心鈞整理，〈翁文灝自訂年譜初稿〉，頁 67。

之年急起苦幹，爲國家建事業，爲後學樹楷模，言下深致責備賢者之意。」¹²⁸ 丁氏期望以學術知識貢獻國事，確有可能再參政，蘇俄考察經驗有可能衝擊了丁氏。知友胡適略此不談，的確出乎意料。有一種可能，或許在於胡適爲顧及與蔣介石之間互動友善，「雪中送炭」，¹²⁹ 不希望提及蔣爲「難以共事之人」，不欲外間多做文章，損及蔣介石號召港、臺反共者共同合作，乘國際時勢進行之政治、軍事反攻。這使得胡適爲求前後論述邏輯一致，選擇性地忽略丁氏政治邊緣人的訊息及其意義。

1930 年代的丁文江既是學人，也是政治邊緣人，從其政論文章也透露出幾許爲政治人物借箸代籌之意。如他在《獨立評論》發表〈假如我是張學良〉、〈假如我是蔣介石〉：

張學良要真有抵抗的決心，這種辦法（按：請中央派人點驗槍枝人數軍實、請中央接收華北稅收）事實上一點不會吃虧，因為，抵抗的事實一發生，平津與華北地盤萬無可以保存的道理。將來退到熱河察哈爾，軍費一定要中央供給的。落得從現在起，先為其他軍隊做一個模範。他不要怕中央不能按期發餉，他只要有抗日犧牲的決心，全國人都會做他的後盾。¹³⁰

假如我是蔣介石，我的辦法是：第一我要立刻完成國民黨內部的團結。……第二我要立刻謀軍事首領的合作。……第三我要立刻與共產黨商量休戰，休戰的為依條件，是在抗日期內彼此互不相攻擊。……以上的三件事實上能做到如何的程度，雖然沒有把握；但是以蔣介石的地位與責任，是應該要做的，做到十分，我們抗日的成功就可以有十分的把握；做到一分，也可以增一分的效能。¹³¹

¹²⁸ 凌鴻勳，〈悼丁在君先生〉，《獨立評論》，第 188 號（1936 年 2 月 16 日），頁 39。

¹²⁹ 近年依據《蔣介石日記》撰寫蔣介石、胡適互動研究，均指出蔣胡在 1956 年前互動大致良好。陳紅民、段智峰，〈相異何其大——臺灣時代蔣介石與胡適對彼此間交往的記錄〉，《近代史研究》，2011 年第 2 期（2011 年 3 月），頁 19-22；任育德，〈胡適晚年與蔣介石的互動（1948-1962）〉，《國史館館刊》，第 30 期（2011 年 12 月），頁 110-121 記述。

¹³⁰ 丁文江，〈假如我是張學良〉，《獨立評論》，第 13 號（1932 年 8 月 14 日），頁 6。

¹³¹ 丁文江，〈假如我是蔣介石〉，《獨立評論》，第 35 號（1933 年 1 月 15 日），頁 4-5。

丁文江的議論顯示注重當前時勢與各方實力分布，從行動利害得失分析，確有可能使政治人物爲之心折。就有學者指出，丁文江在《獨立評論》展現的論述更像是一個唯物主義者，而非《努力》的唯意志主義論者。¹³²

丁文江不談民族大義，並非毫無民族國家觀念。從丁氏的演講顯示，他是理性談民族國家問題，不尚空談。他認爲抗日工作非憑一時熱心即可告成，必須持續不懈，使中國具備自衛能力。青年人必須瞭解現代國家需要，以專門技能發揚愛國意志，使自己成爲增長國家組織力的人才。他不希望青年憑藉一腔熱血，貿然主張戰爭，徒然犧牲，無助國家進步：

目前的問題，不是缺少人，是缺少錢、缺少槍、缺少子彈、缺少服裝，尤其是缺少能指揮和組織的人才。……

今天青年的責任是什麼？青年應該做什麼？他們應該要十二分的努力，徹底的了解近代國家的需要，養成近代國民的人格和態度，學會最低限度的專門技能，然後可以使他們的一點愛國心，成為結晶品，發生出有效能的行為。¹³³

正是從理性思考，爲了備戰、維繫民族生存、使國家步上現代化進步正軌，必須以建立有效率運作之現代政府爲前提，培育政府所需要的人才。因此，丁文江敢違逆憤怒不平的外在輿論氣息，出面公開呼籲青年要冷靜，學習專門技能、從事國家建設，協助國家推進。由此觀察，《字林星期周刊》（*The North-China Herald*）謂丁氏爲「真正愛國者」，¹³⁴並不爲過。費俠莉指出，丁文江在《獨立

¹³² 原文爲：more like a materialist and less like a voluntarist。夏綠蒂·弗思著，丁子霖、蔣毅堅、楊昭譯，《丁文江：科學與中國新文化》，頁 183；Charlotte Furth, *Ting Wen-chiang: Science and China's New Culture*, p. 202.

¹³³ 丁文江，〈抗日的效能與青年的責任〉，《獨立評論》，第 37 號（1933 年 2 月 12 日），頁 4、7。

¹³⁴ “A True Patriot” (January 7), *The North-China Herald*, January 8, 1936, p. 45. 在上海外報稱讚之外，也有部分小報提出反面說，如以丁「為學術」參與科學與玄學之爭，「帶了幾分宗教的口氣」；「為公眾」則「一致主張對外投降，以塘沽協定的擁護者自居。」建，〈我們所哀悼的丁文江〉，《禮拜六》，第 624 期（1936 年 1 月 18 日），頁 469-470。

評論》談論的基本問題在日本侵略和中國工業化；後者也是國家抵抗敵人侵略的先決條件，¹³⁵ 這和當局思想有共通點。

胡適以個人經驗及後見之明分析，希特勒、史達林尚未展現獨裁的真面目，展現為國家埋頭苦幹，帶領國家走向工業化的意向。丁文江看到蘇俄大規模運用專技人士投入地質調查，印象深刻之餘，也為蘇俄政治大規模實驗可能成功感到興奮，¹³⁶ 是人之常情。蘇俄經驗——農業立國國家可以透過地質資源調查、開發國內豐富的天然資源，朝工業化、現代化國家的未來目標前進，為丁氏提供可取法對象。當時中國知識人的共同目標均是使中國政府現代化，因此提出不同路徑選擇，丁文江選擇「新式獨裁」，以集中全部力量於中央政府從事開發而非地方自力執行。政治集權於中央政府不只是學理討論，是政治現實、政治策略及必要手段，是針對南京國民政府名義上統一全中國；但地方仍與中央政府貌合神離而發，目的在抵禦日本侵略。10 年前，丁氏在上海任事，成為廣州國民政府的敵人；10 年後，丁氏希望由有力的中央政府從事資源開發以富強中國，為抵禦外敵侵略備戰，成為南京國民政府的盟友。

胡適不認為丁文江是有意識地傾蘇，而是出自中國與周邊近鄰地緣關係，呼籲重視蘇俄。丁氏不輕易評斷發展之中的不同政治體制與經驗，也是中國從 1920-1930 年間各種蘇俄觀察與書寫類型之一。胡適分析，丁氏相信經濟平等、願為萬世犧牲個人一時的價值與信念，因此希望蘇俄「實驗」成功，也評估其有成功條件（天然資源豐富，所謂「有產可共」）。¹³⁷ 丁氏價值信念經過推導，會衍生成：為維持政府有效運作，個人犧牲一時的價值與信念，即包括犧牲個人自由與人權在內亦不惜；執政者若假富國之名濫權，個人犧牲基本人權之代價將至為慘重。這正是胡適警覺者，也是他從 1930 年代起及至 1950 年代寫作《丁傳》強調之觀點。馮兆基即精到指出，丁文江「新式獨裁」展現中國自由思想中藏有

¹³⁵ 夏綠蒂·弗思著，丁子霖、蔣毅堅、楊昭譯，《丁文江：科學與中國新文化》，頁 180；Charlotte Furth, *Ting Wen-chiang: Science and China's New Culture*, p. 199.

¹³⁶ 胡適，《丁文江的傳記》，頁 166、172。這也是胡適為原本期待蘇俄進步，自 1940 年代起因雅爾達協定、蘇俄在中國東北清洗措施，致使觀點逐步轉變，到 1954 年以公開演講重申個人思想轉變，嘗試表現一貫之記述。

¹³⁷ 胡適，《丁文江的傳記》，頁 168-171。

保守面，是中國近現代政治思想的特殊面向。¹³⁸ 胡適堅持權利保障，丁文江雖基本支持，卻可能對執政者讓步，是胡、丁基本關注焦點與學術訓練之差異。若將 1930 年代自由與政治效率論爭和 1940 年代的自由與經濟平等論爭對照，胡適均站在維護基本自由一方。當胡適描述與丁文江意見差異之同時，也就呈現胡適的政治理念，以及作品與時代互動密切相關。

胡適從學術角度出發，分析丁文江赴蘇俄觀察之價值：

……如果沒有《獨立評論》，他的 漫遊散記 和 蘇俄旅行記 也許至今還沒有整理出來。他為了要「給適之補篇幅」，才把他的旅行日記整理一遍，「把其中比較有興趣的事情摘錄出來」，才成為「漫遊散記」。他的 蘇俄旅行記 也是我們硬逼他寫出來的。這兩部書都沒有寫完，但這四十篇很有趣、很有學術資料，又很有傳記資料的記遊文字的寫成，總可以算是《獨立評論》逼榨出來的一點有歷史意義的成績了。¹³⁹

胡適指出，丁文江會將「不好的印象老實地紀錄下來」，諸如蘇俄聯絡主管的迅速更迭、入境許可的「人治」、盧布兌換機制不明確、衛生條件不佳、民眾對共產黨統治的稱讚與批評。¹⁴⁰ 胡適娓娓道來，自是意指丁文江具有史家一手觀察、記載見聞的素養及秉筆直書的能力，不受反蘇、媚蘇意見羈絆。胡適以為，無論反蘇、媚蘇，都得經過親身經驗觀察體會，以及理性分析觀點，透過評論丁氏文章貢獻浮現於讀者眼前。

既然在胡適描述下，丁文江是關注時局、一度參政的學人，於蘇俄經驗所受衝擊，便可能稍作修飾。丁文江在蘇俄考察期間、回國後，都有讚許言論，如「丁對蘇聯的印象非常好。他贊成在目前情況下的現有制度。」¹⁴¹ 傅斯年亦指出，丁文江返國後，一度意欲辭卸教書，期望專心著書 4、5 年，「精神反常」，不久後「被蔡先生和大家把他拉到中央研究院去了」。¹⁴² 胡適淡然表示：「他回

¹³⁸ Edmund S. K. Fung, *The Intellectual Foundations of Chinese Modernity: Cultural and Political Thoughts in Republican Er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16.

¹³⁹ 胡適，《丁文江的傳記》，頁 146-147。

¹⁴⁰ 胡適，《丁文江的傳記》，頁 164-165。

¹⁴¹ 上海市檔案館，《顏惠慶日記》，第 2 卷，頁 767，1933 年 9 月 8 日。

¹⁴² 傅斯年，〈丁文江一個人物的幾片光影〉，頁 11。「大家」也包括傅斯年。

北平好像是在 11 月初。他在蘇俄的旅行是很辛苦，很不舒服的，回國後感覺身體不大好。感覺兩手兩足的極端有點變態，所以曾在協和醫院受過一次詳細的檢查。檢查的結果是他有血管開始硬化的象徵。他有一個短時期的消極，就是孟真說的精神反常，確是事實」。¹⁴³ 胡適將傅斯年稱丁氏返國後「精神反常」，歸結為個人健康狀況不佳。胡適分析固然值得注意，唯另可從其他面向觀察。1933 年 6 月 18 日，中央研究院總幹事楊銓（1893-1933）遇刺身亡，蔡元培院長有意延攬丁氏任總幹事，傅斯年即致函丁勸說接受，丁正準備出國開會，未表同意。¹⁴⁴ 直至 1934 年 3 月間，始透露接受意願。從時間點顯示，丁氏於自我出處之思考，難以排除受到蘇俄考察經驗衝擊之可能。胡適選擇強調丁文江的健康因素，目的在淡化蘇俄考察影響。若再和胡適處理 1930 年代中期丁氏參政與否問題相對照，或可理解胡選擇淡化蘇俄經驗，不只與寫作時代有關，也與強化丁氏學人形象（淡化政治邊緣人形象）息息相關。但面對丁氏政學經歷相輔的心理關懷，一旦透過其他材料檢證，胡適論點就顯得侷限，也與人物的真實心態有距離。胡適強調丁氏多樣性學術活動、優秀學術行政能力，強化丁氏「學人」形象、淡化「政治邊緣人」之寫作策略，便可能讓胡偏離傳記寫作「說實話」標準。或許胡適可以自解「讓材料說話」，指出重要歷史意義與人物思想即可，也就不會偏離「說實話」標準。透過史料究其實，丁氏確是學人，也是政治邊緣人。

《丁傳》末尾，胡適痛惜好友過早逝世：救治丁文江的湖南「新醫學」、「西醫」若有救治煤氣中毒病患的經驗，不致做出錯誤的判斷與醫療，致使丁氏過世。¹⁴⁵ 胡適為求慎重，不欲情溢於理，這一段還特別先請中央研究院朱家驊院長、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李濟閱讀，提出修改意見後再完成。胡適顯然不希望因為該年中醫學校籌設爭議，¹⁴⁶ 轉移《丁傳》學人形象焦點。這則屬於案外案。

¹⁴³ 胡適，《丁文江的傳記》，頁 137。

¹⁴⁴ 1931 年 2 月中起，丁獲聘史語所特約研究員。傅氏信函全文，參見潘光哲，〈丁文江與史語所〉，收入杜正勝、王汎森等主編，《新學術之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年紀念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8 年），上冊，頁 381-383。感謝匿名評審委員之提醒。

¹⁴⁵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 9 冊，頁 183，1956 年 3 月 12 日。

¹⁴⁶ 〈胡適致朱家驊函〉（1956 年 7 月 14 日），收入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 7 冊，頁 2539。按立法院於 1956 年 3 月 27 日通過議案籌設中醫學校及中醫研究機構。

伍、結語

胡適運用研究方法，寫作《丁傳》，具有高度學術價值與文字可讀性，的確有助於展現丁文江豐富的學術活力與能力，讓讀者知道傳主多采多姿的活動，這的確不負胡適下功夫蒐集資料，耗費 3 個月時間專心寫作之功。胡適不僅收到丁文淵函謝稱傳記「立論極正」，是「紀念冊的一篇最佳文字」。¹⁴⁷ 楊聯陞（1914-1990）致胡適函在學術上與心理上給予長輩雙重安慰：

再多謝您賜寄您的《丁文江傳》，周法高的（按：贈書）見到就交給他，這樣生龍活虎一般的學人，實在難得。您出力寫這篇傳，不但表彰故人，也可以讓後學聞風興起。¹⁴⁸

《丁傳》正體字版，至少有 1956 年中央研究院院刊紀念號、1960 年啓明書局單行本、1973 年胡適紀念館增訂版，1988 年臺灣遠流出版社《胡適全集》；簡體字版本至少有 1998 年北京大學出版社《胡適文集》、1999 年安徽教育出版社《胡適全集》等發行，具有相當意義及影響，是功不唐捐。

胡適甚為斟酌好友丁文江傳記之撰寫時機，不願輕易下筆。1950 年代中期，中共發動「批胡」運動達到高峰，以及好友過世將屆 20 年，兩種因素交織

《自由中國》隨即刊登社論（〈不能接受的「籌設中醫學校」案〉，《自由中國》，第 14 卷第 8 期，頁 4），《自由人》刊文示意不贊成。毛子水亦發表〈論立法院通過「籌設中醫學校」〉贊同兩刊議論，指出教育經費分配、授課師資的問題，恐怕短期難行；病患也可自行抉擇看病醫生，不致強迫接受中醫診治。毛子水，〈論立法院通過「籌設中醫學校」〉，《自由中國》，第 14 卷第 9 期（1956 年 5 月 1 日），頁 9、13。《自由中國》陸續登載文章，表示設校舉措是對「五四」象徵科學、進步精神之反撲，「故步自封、開倒車、反科學傾向。籌設中醫學校只是此種傾向中的一個代表作而已。」參見龍遠銘，〈由「中醫學校」想起〉，《自由中國》，第 14 卷第 10 期（1956 年 5 月 16 日），頁 30。現階段未接受科學知識教育，不熟悉科學技術、方法與具備研究能力的中醫從業者，無法擔任中醫教學與研究工作。貿然設校將造成醫學科學知識傳授之紊亂。如濱，〈論「籌設中醫學校」案與所謂中西醫問題〉，《自由中國》，第 15 卷第 5 期（1956 年 9 月 1 日），頁 10-14。

¹⁴⁷ 「丁文淵致胡適函」（1956 年 11 月 20 日），〈與丁、刁、卜姓的往來書信〉，美國檔，《胡適檔案》，館藏號：HS-US01-071-017。

¹⁴⁸ 〈楊聯陞致胡適函〉（1957 年 2 月 1 日），收入胡適紀念館編，《論學談詩二十年：胡適楊聯陞往來書札》，頁 376。

才使這位承擔重大使命的「後死者」，爲了呈現同代人的價值與省思，奠立思想傳播堅實的基礎而撰寫《丁傳》。他無法就近使用傳主遺留一手史料，借助友人與晚輩力量蒐集報刊史料，依舊完成一本合乎學術寫作規格的史學著作，清晰反映他重視史料及傳記寫作之自我要求標準。胡適並未採取國民黨正統史觀爲書寫價值，並未貶損丁文江在孫傳芳治下從政的作爲，尊重史實；也不以史觀凌駕於史實，截然不同於中共政權建政提倡之革命史觀。他以反共立場居於美國，可以不受中共意識型態及國民黨正統史觀羈絆，維持言論自由。

今天重新檢視《丁傳》，從時代環境分析胡適之寫作背景、人物形象的樹立之餘，的確可以注意到在史料侷限與解釋角度、人物形象樹立標準下，和今人見解之間的差異與新發現（是學人，也是政治邊緣人），後人藉此重新檢視《丁傳》之價值，與丁文江的真實面貌，也重新省思知識人擺盪於學術與政治之間的心境。

徵引書目

一、檔案

《北洋政府外交部檔案》（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

〈礦政雜項〉，礦務—礦務雜項。

《胡適檔案》（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紀念館藏）

〈與丁、刁、卜姓的往來書信〉，美國檔。

〈與其他張姓的往來書信〉，美國檔。

〈與勞姓的往來書信〉，美國檔。

〈與朱家驊的往來書信〉，南港檔。

《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國史館藏）

〈一般資料—民國二十二年（一）〉。

〈一般資料—民國二十二年（二）〉。

〈一般資料—黨國先進書翰（二）〉。

〈革命文獻—財政經濟〉。

〈特交文卷—親批文件—民國二十三年一月至民國二十三年四月〉。

〈特交檔案—一般資料—民國二十三年（五十）〉。

〈特交檔案—一般資料—民國二十四年（十八）〉。

〈特交檔案—一般資料—民國二十四年（十九）〉。

〈特交檔案—一般資料—民國二十四年（四十一）〉。

〈籌筆—統一時期（八十七）〉。

〈籌筆—統一時期（一〇三）〉。

〈籌筆—統一時期（一一二）〉。

〈籌筆—統一時期（一四〇）〉。

《王世杰日記》，近代史數位資料庫，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二、史料彙編

上海市檔案館譯，《顏惠慶日記》。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1995 年，第 1、2 卷。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編，《胡適來往書信選》。北京：中華

書局，1979 年。

王正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 16 冊（民國 21 年 8 月至 9 月）。

臺北：國史館，2004 年。

周美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 25 冊（民國 22 年 3 月至 4 月）。

臺北：國史館，2006 年。

房兆楹輯，《清末民初洋學學生題名錄初輯》。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2 年。

胡適紀念館編，《論學談詩二十年：胡適楊聯陞往來書札》。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年。

高素蘭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 31 冊（民國 24 年 5 月至 24 年 7 月上）。臺北：國史館，2008 年。

黃自進、潘光哲編，《蔣中正總統五記·愛記》。臺北：國史館，2011 年。〔即原王宇高、王宇同編，《蔣中正總統愛記》〕

張朋園、沈懷玉合編，《國民政府職官年表》，第 1 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

萬麗鵬編註，潘光哲校閱，《萬山不許一溪奔——胡適雷震往來書信選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 年。

三、文集、回憶錄、訪談錄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年。

沈雲龍訪問，林能士、藍旭男記錄，《凌鴻勛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 年再版。

周德偉、周德偉先生回憶錄編纂小組，《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臺北：遠流出版事業公司，2011 年。

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 年。

胡適，《四十自述》。臺北：文海出版社，1983 年〔上海：亞東圖書館，1933 年〕。

胡適等，《丁文江這個人》。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7 年。

胡適，《丁文江的傳記》。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 年。

翁心鶴、翁心鈞整理，〈翁文灝自訂年譜初稿〉，《近代史資料》，第 88 號（1996 年 5 月），頁 47-104。

耿雲志、歐陽哲生編，《胡適書信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

黃炎培原著，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整理，《黃炎培日記》，第 2 卷。北京：華文出版社，2008 年。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4 年。

蔣廷黻著，謝鍾璉譯，《蔣廷黻回憶錄》。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 年。

錢昌照，《錢昌照回憶錄》。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8 年。

四、期刊、報紙

《申報》，1926、1932、1936 年。

《自由中國》，1956 年。

《努力週報》，1922-1923 年。

《研究與批判》，1936 年。

《國聞週報》，1926 年。

《獨立評論》，1932-1936 年。

《禮拜六》，第 624 期，1936 年 1 月 18 日。

The North-China Herald (Weekly Edition of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字林星期周刊》), January 8, 1936.

五、專書

王鴻禎主編，《中國地質事業早期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 年。

宋廣波編著，《丁文江年譜》。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9 年。

沈衛威，《自由守望——胡適派文人引論》。上海：上海藝文出版社，1997 年。

谷小水，《少數人的責任——丁文江的思想與實踐》。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 年。

侯外廬，《揭露美帝國主義奴才胡適的反動政治面貌》。漢口：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 年。

胡適，《胡適論學近著》，第 1 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 年。

唐德剛，《胡適雜憶》。臺北：遠流出版文化事業公司，2005 年。

夏綠蒂·弗思著，丁子霖、蔣毅堅、楊昭譯，《丁文江：科學與中國新文化》。長沙：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1987 年。

許紀霖，《尋求意義：現代化變遷與文化批判》。上海：三聯書店，1997 年。

陳儀深，《《獨立評論》的民主思想》。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9 年。

陶菊隱，《蔣百里先生傳》。臺北：文海出版社，1971 年。

章 清，《胡適評傳》。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2 年。

彭 鵬，《研究系與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以 1920 年前後為中心》。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3 年。

歐陽哲生，《科學與政治——丁文江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年。

錢理群，《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 1949-2009：另一種歷史書寫》。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2 年。

羅志田，《亂世潛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

六、期刊論文

丁文江遺稿，宋廣波整理考釋，〈送嘉定秦汾君東歸序〉，《中國科技史雜誌》，第 33 卷第 2 期（2012 年 4 月），頁 222-225。

任育德，〈胡適晚年與蔣介石的互動（1948-1962）〉，《國史館館刊》，第 30 期（2011 年 12 月），頁 103-143。

何漢威，〈史語所藏丁文江檔案的收藏原委、編輯整理及史料價值舉隅〉，《古今論衡》，第 12 期（2005 年 3 月），頁 3-34。

何漢威，〈（書評）宋廣波編著，《丁文江年譜》〉，《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65 期（2009 年 9 月），頁 157-163。

何漢威，〈一九二六年淞滬督辦公署總辦任內的丁文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81 卷第 1 分（2010 年 3 月），頁 37-150。

吳景平，〈蔣介石與戰時美國對華財經援助〉，《史學月刊》，2011 年第 1 期（2011 年 1 月），頁 70-79。

李學通，〈胡適與翁文灝〉，《科學文化評論》，第 3 卷第 1 期（2006 年 2 月），頁 107-115。

胡尚元，〈胡適思想批判運動及其消極影響——史學領域的一個視角〉，《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29 卷第 3 期（2005 年 5 月），頁 107-111。

陳紅民、段智峰，〈相異何其大——臺灣時代蔣介石與胡適對彼此間交往的記錄〉，《近代史研究》，2011 年第 2 期（2011 年 3 月），頁 18-33。

張朋園，〈胡適與梁啟超——兩代知識分子的親和與排拒〉，《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15 期（1986 年 12 月），頁 81-108。

潘光哲，〈丁文江與史語所〉，收入杜正勝、王汎森主編，《新學術之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紀念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

所，1998 年，頁 379-400。

七、英文論著

Cohen, Paul A.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Furth, Charlotte *Ting Wen-chiang: Science and China's New Cultur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Fung, Edmund S. K. (馮兆基) *The Intellectual Foundations of Chinese Modernity: Cultural and Political Thoughts in Republican Er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Grieder, Jerome B. *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 Liberal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10-1937*.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